

摘要

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及各种规划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科学是发展的先锋和近卫军。近年频频袭击北京的沙尘暴与内蒙古连续七年荣登全国 GDP 增幅榜首和黄河中游鄂尔多斯市的“蒙 K—猛开”模式使国人再次把关注发展的目光从东南沿海转移到内蒙古、草原和畜牧生计。

锡林郭勒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草原，也是国际上公认的欧亚大陆典型草地样板。本文描述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温带草原自然保护区。白音锡勒牧场的发展轨迹又是整个内蒙古草原的现代化缩影。本文以白音锡勒牧场为田野点，讲述了该场发展中的人—草—畜平衡理念与现代国家在这里推行各种移民—改制—畜种改良中发生的故事，探讨了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生态观与草场管理制度、传统科技知识与现代权力话语之间的博弈关系，以期为读者理解今日内蒙古草原面临的生态与文化困境之根源所在提供一种牧民本位的观点和思路。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和第五章为开篇和结论，第二、三、四章为论文主体。

第一章绪论交待了田野点选择理由及白音锡勒牧场的自然条件并回顾了牧场发展史。本文题目中的“陌生人”有两层含意：一是负载着内地农耕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移民人群，二是带有西方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现代草原科学和草原研究者。由于人是草原生态中最有能动性的要素，所以传统而多变的草原与现代而执着的科学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类似于“陌生人”那种因欠缺相互理解而产生的紧张关系。本章的文献回顾部分在综述关于草原生态和畜牧生计发展的几组对话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的看法，进而交待了本文的写作思路、过程、创新点和局限性。

第二章“移民与发展”回顾了白音锡勒牧场人口迁入与移出的过程和原因。人口迁入以牧场招工、城市知青和兵团战士为主线，人口迁出则以近年来在没有明确定义的前提下实行的“生态移民”和“两转双赢”为切入点。本篇粗浅考察了“发展”的含义，区分了作为居民福祉的发展与作为社会变迁手段的发展并分析了两种发展的不同后果。

第三章“草原与体制”回顾了牧场经营方式和草原管理体制变迁，论述了传统“自然”的互主性综合含义及其演变成现代“自然”、而与文化对立两分的过程和后果，指出草原围栏政策乃是传统农耕文化心态与



Y1821266

现代国家政治体制基于对游牧民族根基及家园的共同误解下的产物。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世界领先的多民族国家管理体制至今不能深入实施，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章“科学与权力”讲述的是白音锡勒牧场建立“锡林郭勒盟种畜场”的成就和挫折。锡林郭勒盟的畜牧科技与今日内蒙古草原政策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排除了人文关怀的农业科技一直是现代草原建设最有权威的话语。本部分通过分析几位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当地人对草原困境的解决方案案例，得出三点结论：

一是畜牧科技的推广传播始终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二是畜种改良虽然屡遭失败却始终是发展现代化畜牧业的重要手段；三是基于平衡生态系统的现代草原科技知识始终能在“非平衡生态系统”的内蒙古干旱半干旱草原上站在政府和市场一方参与博弈，共同向传统游牧知识及其选育出来的本土“五畜”推行科学圣战。

第五章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中国草原生态恶化和畜牧生计衰退的根源既不在于传统游牧生计落后，也不在于现代科学技术无能，而是主流社会发展观仍然停留在 19 世纪现代化初期的“社会发展史”阶段。这种含有欧洲中心论和文化优生学即文化沙文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由于其“现代性”，所以能通过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不断复制传播，因而始终是构建和谐、维护自然生态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最大天敌。本文基于对内蒙古草原生态和畜牧生计的实地调查，以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为指导，得出关于维护草原生态、畜牧生计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建议，即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按照温家宝总理 2010 年两会报告提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执政理念，以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为契机，推动一场“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式和发展方式变革。

关键词 发展，草原，畜种，科技，文化生态学

ABSTRACT

The booming of civi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fosters the most frequent appearance of the term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mong various project documents, while some basic questions like the types, connotations and functions (whether development is the Panacea of social and culture dilemma) of development still left unanswered. Sand storm and the rapid increase of GDP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bbreviated as IMAR hereafter) attract public attention. The distance from Xilingol Steppe to Beijing is the nearest among all the pasturelands in IMAR and it is also recognized as the prototype of Eurasia temperate steppes. I did my field work at Baiyinxil State-Owned Ranch which is the core of first national steppe reserve in China.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nch is so typical that it could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Xilingol steppe, even IMAR. The thesis depicts the relationship of herders, steppe and stocks which further account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ree pairs: population flow and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nature and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science and power. It is the author’s wish that the thesis could help to understand the dilemma of the Mongol herders, their 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live.

The thesis is composed of five parts. Part II, III and IV are the main body.

Part I Introduction This par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and some basics of the Ranch. A point to note is that the concept of stranger refers not only to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but also science—which is the key of the Ranch’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but it is still a familiar stranger to the Ranch.

Part II This part depicts the population flow in the Ranch. The inward flow happened from 1950s to 1984 and members are mainly enrolled workers from surrounding provinces, yout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oldiers organized by the country to reclamate the steppe; the outward flow happened when the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policy implemented in the Ranch. Further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nature of development—the improvement of well-being or development as a process which leads to the change in social structure.

Part III After a short review of the Ranch's management history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this part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nature" in different context and how the nature and culture were dichotomized as well as the consequences reflected in the management policy on Xilingol steppe. It is the author's argument that grassland fencing policy is the co-product of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modernization science.

Part IV The history of Breeding Stock Factory par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Ranch, scientific history as well as the initiation of IMAR's grassland polic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come the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and the edge of grassland knowledge. Respective talks with a natural scientist, a social scientist and a local herder about the environment dilemma in the Steppe provided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1. The spread of animal husbandry science shows that it is strongly interfered by the government;
2. The fact that stock breeding science was and is the focus of modern animal husbandry, even though it is doomed to fail in the Stepp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Ranch, reveals that modernization is greatly valued in Steppe.
3. Modern science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non-equilibrium steppe and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power as well.

Part V Conclusion

KEY WORDS Development, Nature, Fence, Power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陌生人”概念.....	2
第二节 论文梗概.....	5
第三节 相关研究动态.....	7
一、 人口迁移及其影响研究.....	7
二、 草原管理制度变迁研究.....	11
三、 畜种改良研究.....	12
四、 本文创新点：游牧文化科技价值和生态伦理.....	13
五、 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15
六、 创新之处与不足.....	16
第二章 移民与发展：白音锡勒牧场的人口流动与发展.....	17
第一节 白音锡勒牧场简介.....	17
一、 地理环境.....	17
二、 牧场简史.....	18
第二节 白音锡勒牧场的人口流动.....	20
一、 人口迁入及后果.....	20
二、 人口迁出.....	23
第三节 哪种发展：生态移民还是“经济”移民?.....	25
一、 发展理论的沿革和本质.....	25
二、 “两转双赢”之人口转移.....	27
(一) 生态移民.....	27
(二) “两转双赢”之“合理”性.....	29
三、 结语与讨论.....	33

第三章 草原与体制：反思草原围栏化.....	34
第一节 从开荒到围栏.....	34
一、 话说“闲荒”.....	34
二、 主流社会自然观的丢失.....	36
三、 游牧民族的生态伦理.....	37
第二节 生产方式变迁.....	39
一、 历史溯源.....	39
二、 解放初期至“双承包前”.....	40
(一) 解放初期的经营方式.....	40
(二) 草畜双承包及“双权一制”的落实.....	41
第三节 分析和反思.....	42
一、 分析.....	42
二、 围栏化的文化反思.....	45
第四章 科学与权力：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畜种改良及其他.....	46
第一节 畜种改良的现代性隐喻.....	46
一、 何为“现代化”？.....	46
二、 畜种改良概况.....	47
三、 分析和讨论.....	48
第二节 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科技.....	53
一、 “两转双赢”之优化产业结构：学者与地方政府的观点和实践.....	53
二、 高科技喷灌技术.....	55
三、 引进第六畜：多样的草原生态观与脱困法.....	56
四、 讨论：科技知识与权力.....	58
第五章 结论.....	60
参考文献.....	66

第一章 绪论

如果让一个没去过内蒙古自治区的普通中国人描述他/她心目中的内蒙古，答案会是什么：“草原”？“游牧”？“GDP 连续七年全国增幅第一”？“袭击首都北京、袭击宝岛台湾（或更多城市）的沙尘暴”？还是“鄂尔多斯的‘蒙 K—猛开’发展模式”？民族学人类学是研究“他者”和以小案例彰显大关联的学科。笔者想通过一个国营牧场几十年的变迁讲述一个发展的故事。过去百年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实践过（和实践着）所有发展理论和政策，百折不挠地致力于发展经济，其结果却是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民族文化危机四伏。而如今摆脱困境的文化新突围又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始了。

本文田野点选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东南 55 公里的白音锡勒牧场。当地人习惯简称它为 31 团，因为该牧场曾在内蒙古军垦时期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5 师 31 团接管，而军垦结束后又划归地方。选点理由有三：

首先，该牧场在内蒙古畜牧史上有独特地位。1950 年，政府在锡林郭勒草原建立白音锡勒国营牧场，后改称锡盟种畜场。这标志着现代畜牧饲养技术引入草原。1956 年，第一个机械化饲料基地在此建成。1964 年，国务院批准在种畜场基础上建立现代化草原畜牧综合试验研究中心。^①1978 年，中国科学院在此建立生态系统定位站，并很快形成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重点站和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重点项目示范站。1985 年 5 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批准成立以白音锡勒牧场为中心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的五个核心区——扎各斯台天然湖、阿卜都尔杨桦林区、沙地红皮云杉林区（全球地理纬度最高）、哈不其拉峡谷和熔岩台地——均位于白音锡勒牧场范围内。这里被国际上公认为欧亚大陆典型草地样板。“科技兴场”是锡林郭勒种畜场初建至今的口号。因此现代科技在内蒙古草原的现代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科学信条对国家草原政策制定所起的作用，将是本文探讨的主题之一。

其次，白音锡勒牧场的人口构成及流动堪称典型。建场之初，前来开发这片“无主之地”^②的职工仅有 20 人。后来的知青和兵团战士曾使牧场人口达到 1.1 万，而且

① 该中心的建设与正常科研工作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停止，中心随即被撤。

② 对牧场所在地原住民的介绍几乎没有，本人只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的内部出版物《内蒙古民族团结革命史料选编》（第 36 页）文献上找到了对该地区仅有的一点记载：该地为布里亚特蒙匪聚居地，靠近查干诺尔碱矿，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这里击退蒙匪。据猜测因为该地靠近水源和碱矿（游牧民每年在固定时间都要让牲畜食用舔食碱以补充牧草之外的营养），故此地应为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游牧之地。

来自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是当时的内蒙古之最。但牧场人口的最高峰出现在 1982 年，达 12959 人。^①当时知青和兵团战士已经返城^②。然则这近 1.3 万人如何构成？锡林郭勒盟近年实施“两转双赢”政策，场部领导称该场已在执行生态移民和城镇化政策中转出 1/3 人口。但有关牧场现状的文件上显示出 2008 年牧场人口仍为 1.2 万。此外，通过合并中小学校，牧民子女进城上学，父母要进城陪读，在客观上起到了助推城镇化的效果。那么新来草原的又是些什么人？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欧玲（Elinor Ostrom）的研究显示，人口流动状况是研究草原管理规则的要件之一。白音锡勒牧场过去四十年人口大规模流动显然是难得的素材。

再次，白音锡勒牧场经营方式转制。当地建场之初实行过（新）苏鲁克放牧制。^③集体化和军垦时期大力发展过农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过草畜双承包制，近年来又搞了草场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双权一制”，且草场以户单位进行围栏。牧场数据显示：当地草原生态恶化不是出现在牧场人口和牲畜头数最多的时候，而是出现在围栏化之后。这一事实使得学界政界广泛传信的生态恶化缘于“超载放牧”的说法显得牵强。倘若人口压力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主因，那锡林郭勒盟乃至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实行的生态移民又怎能解决草原困境？生态移民到底是“发展”的目标，抑或只是“发展”的手段或步骤？

相对内蒙古自治区来讲，白音锡勒牧场面积不大。但这里上演过内蒙草原发展的所有故事。内蒙古大学经济学系刘仲龄教授在内蒙古草原工作多年，与其访谈时他说“白音锡勒是锡林郭勒草原的缩影”。笔者经过考察，更认为白音锡勒是整个内蒙古草原的现代化缩影。以此为田野点颇能以小见大。在这里找寻牧场发展问题的原因和办法，能为解决内蒙古草原在“发展语境”下面对的问题提供借鉴。

第一节 “陌生人”概念

本文题目《本土的“陌生人”——白音锡勒牧场发展的故事》借鉴了美国历史学家李普曼（Jonathan Lipman）介绍中国回族的经典之作《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他把西北穆斯林描述为中国边缘具有二元特征的社会群体^④。他用“熟悉的陌生人”这一术语揭示了穆斯林与中国主

①（1984 年，各年人口数量详见正文表 1）

② 据场领导及当地人介绍，只有一对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知青夫妻留在了牧场，其余兵团战士和知青均在八十年代初返城。

③ 苏鲁克制度是蒙古族传统放牧制度，其主要特点为草场牲畜归王宫所有，牧民通过放牧牧主的牲畜得到分成。解放初期内蒙古草原上实行了新苏鲁克制度，内容详见第一章。

④ Jonatha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流社会之间独特的互动方式。白音锡勒牧场上的人多为锡林郭勒盟周边的汉族移民。他们用自身携带的文化基因，以自己认为先进和科学的方式努力“建设”和“管理”草原。^①笔者觉得“陌生人”概念最能概括这些“外来”的草原建设者的特点。他们既包括已在当地定居生活的移民，也包含从事草原研究的常驻或流动知识分子。他们居住和生活在“草原”这个空间里，距离草原如此之近，却永远无法像当地人一样真正了解草原。从这个意义上讲，草原与他们彼此陌生。^②

在场的“陌生人”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瑞泽尔编著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根源》引用了齐美尔论述陌生人与距离（Distance and Stranger）间关系的一段话：

… The stranger is one who is neither too close nor too far. If she came too close, she would no longer be a stranger; she would be a member of the group. However, if she was too far away, she would cease to have any contact with the group. Thus, to be a stranger involves a combination of closeness and distance… The stranger is not only a social type, but we can discuss strangeness as a social form of interaction.^③

由此可见，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既是客观社会事实又是主观感受，既是时间的概念也是空间概念。齐美尔进一步指出：“这里的陌生人不是此前人们接触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陌生人是群体本身的一个要素……它的内在的和作为环节的地位同时包含着一种外在和对立。”^④

齐美尔强调陌生人与本地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空间上的二重性：物理空间接近而社会空间疏远。这些陌生人身处本地人之中，但不属于本地人群体。陌生人与当地人的关系若即若离又不即不离。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因此而特殊。

布莱克（Donald Black）和李维恩（D.N. Levine）后来发展并细化了齐美尔的学说。布莱克认为陌生本身也是一种关系。他写道：人类关系中远与近的统一体现于陌生人现象中：“最简单的表述是：相对于一个人而言，距离意味着对方虽在身旁但心理感觉遥远，陌生意味着对方虽心理感觉遥远但实际接近。”^⑤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1997.

① 之所以在这里使用双引号，是因为我认为“建设”与“管理”等词汇是将人与自然两分、将自然客体化的结果，关于“自然”一词含义的演变以及它对制定中国环境政策的影响将在本文的第二章中论述。

② 要声明的一点是：此处使用的“陌生人”概念并不适用作为“外来人”（包含“客观”的含义）来研究“他者文化”的人类学式的用法。

③ 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根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④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第341-342页。

⑤ 唐纳德·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页。

Levine 指出“陌生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分类系统。^①每个类别由两大维度决定：陌生人试图与当地社区建立的关系与本地人对陌生人的反应。将这两个维度交叉，就能看出一个陌生人所属的两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过访者”（visitor）。过访者多半抱着好奇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没有在当地定居的计划，因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地方知识”，对当地社区的欣赏与批评标准都是外来的。民族学人类学因而强调田野工作的时限，以确保研究者能够与当地入有效沟通，掌握地方知识，形成当地视角。做到这一点，民族学人类学家的“访客”身份就会有所转化。

第二类“新来者”（newcomer）。这样的人虽然也是一种外来陌生人，却试图理解当地文化，并想加入当地人行列的“新来者”。^②这种新来者对本地文化、本地人生活的态度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本地人重合。

本文白音锡勒牧场的大部分职工、家属都来自周边的赤峰、通辽、远至河北山东。他们来自中国内地，大多有过务农经历。从移民定义上讲，他们是本土人：与目标地方的原住蒙古人有相同的国籍、隶属相同的文化大传统。但是他们从前精耕细作的农耕生计方式与当地游牧文化之差异，农田与草原在生存景观（landscape）上的不同、语言沟通上的障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然、环境乃至其他生灵的不同态度，使得他们^③又是标准的“陌生人”。而且这种“陌生”是双向的：既包含移民对草原和蒙古文化的陌生，也包括草原和原住民对移民及其文化的陌生。空间距离来讲，这些“陌生人”已经在这里居住、生活、繁衍后代，距离草原是如此之近；而不论是在实地调查还是在网络空间中，当被问起“你是哪里人”时，他们仍会首先说出祖籍，然后才说现住内蒙某某地。他们的主观意识距离当前繁衍生息的土地很远。他们因而既是草原“熟悉”的“陌生人”，更是来自“本土”的“陌生人”。

① D.N. Levine (1977), "Simmel at a Distance: On the History and Systematics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Stranger", *Sociological Focus*, Vol. 10 pp.15 - 29

② Alfred Schutz, "The Stranger: 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9, No. 6 (May, 1944), pp. 499-507

③ 在这里未使用“蒙古族”一词的主要原因是牧场现有一部分来自辽宁建平和朝阳地区的农耕蒙古人，他们中一部分是牧场发展过程中招工而来，还有一部分是为了躲避政治运动从东北一些蒙古族聚居区自发迁移到这里的，因为锡盟草原上在解放初期土改时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牧主牧工两利”的“三不两利”政策。在笔者采访过的白音锡勒牧场的部分汉族职工眼里，因为这些农耕蒙古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和我们一样，懂得精打细算过日子”“脑子活”而得到了他们的认同；但是他们也因为基本无法使用蒙语进行交流等原因，较少融入当地原著蒙古人的社区。故在此将蒙古族和当地原著蒙古人进行区分。

第二节 论文梗概

牧民—草场—牲畜是草原生计的三大必备要素。本文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移民与发展、草原与体制、科学与权力为主题。

第一部分：移民与发展——白音锡勒牧场的人口流动与发展。白音锡勒牧场 1950 年建场之初目的就很明确：要在内蒙古草原建立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畜牧业基地。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和刚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都急于发展经济。“发展”一词成了贯穿白音锡勒牧场各项事业的主线。随后来自全国 22 个省、市的知青和兵团战士为了支援边疆建设、发展边疆经济进入草原。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为使广大牧民脱贫而于 2003 年开始实行“两转双赢”（“两转”即牧区人口转向城市、转变观念；“双赢”指增加牧民收入和保护生态环境）。本篇追问了“发展”的含义，即作为福祉结果的发展，还是作为变迁过程的发展，并分析了两种发展的区别及不同后果。

第二部分：草原与体制——牧场经营方式、制度变迁的影响及政府对策。白音锡勒牧场建厂至今经历了人民公社、牧业合作社、牧业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及“畜草双承包”等经营方式变迁。它对于地方社区、传统文化的冲击作用不可忽视。其中尤以草原围栏化对当地人传统空间概念、自然概念的冲击为甚。本部分回顾了“自然”一词在传统文化中的综合含义及其演变成现代自然（nature）与文化（culture）对立两分的过程和后果，指出草原围栏化政策是农业文明与西方现代科技观念共同作用的产物。

第三部分：科学与权力——畜种改良的隐喻：科学与技术之于内蒙古草原生态建设。白音锡勒牧场发展史中的“锡林郭勒盟种畜场”阶段对于本论文、锡林郭勒盟畜牧科技史乃至今日内蒙古草原政策的形成意义重大。科技是现代草原建设最有权权威的话语，而科技活动更是国营牧场畜种改良的前锋。接踵而来的大规模畜牧业机械引进，推广人工飞播种草、灭毒草、灭蝗等。本部分通过分析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当地人对草原困境的看法，得出三点结论：

1. 畜牧技术的推广传播具有极强的政府干预性。在 1978 年以前集体经济时期，技术引进完全由政府决定。1980 年代后的商品经济对畜产品需求量增加，政府各部门为追求最大效益，利用各种手段提升畜牧饲养技术，从而为畜牧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2. 畜种改良虽屡遭失败，却始终被视为发展现代畜牧的有利手段，其原因在于它的“现代性”。

3. 在“非平衡”的内蒙古半干旱草原，科技解释始终站在权力一方参与博弈，因而值得特别关注。

第四部分：结语与讨论。

白音锡勒牧场是内蒙古畜牧业的缩影，也是锡林郭勒和整个内蒙古草原科技的缩影。长期以来，内蒙古草原管理政策基于以下两个研究角度制定：

首先，草原评价方法基于美国植物生态学家克莱门茨创立的静态、平衡草原模型。该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具有内部调控能力，因而其动态具有方向性和可预测性。中国科学界的草畜平衡、以草定畜之说，地方政府的载畜量制定都以此为据。从此，科学知识和术语逐步取代了蒙古族传统（多与“落后”替换使用）的生态知识。近年锡林郭勒盟实行的“围封转移”政策也是基于这种科学假设：即围封草场移出牧民就能恢复草场植被。^①近十五年国外的生态学研究证明：内蒙古干旱半干旱温带草原属于非平衡（non-equilibrium）和动态类型，充满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性^②。也就是说，先前作为决策依据的科学理论前提仍需验证。

其次，主流学界曾经几乎完全认同哈丁的“公地悲剧”假设：由于公共资源稀缺，所以每个人都会像困境中的囚徒一样想把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只有牧民自己拥有草场使用权时，才会爱护它。国家因此倡导围栏化并希望以此达到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目标。

我们通过对上述两个理论的分析，发现当政府要依据理论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时，就会努力缩小甚至消除事物之间的异质性而放大同质性，再使简化后的假设成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最终陷入试图用一种政策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Panacea)“陷阱”。其结果是解决问题的政策本身变成了问题的根源。

解决草原困境的最大挑战首先是接受而不是拒绝复杂性，科学研究领域如此，政府管理亦然。既然草原生态充满变数，那我们对草原的理解就应该有多个层面。因此，草原的发展和生态困境就不是某个学科所能解决的，而应综合采用人文、生态、社会等多层次的制度体系。简单、线性的认识论无法解决具有公地性质的草原管理制度难题。

最后，由于跟草原和牲畜打交道的既不是政府也不是科学家，而是作为发展主体的牧民，所以任何发展项目如果没有发展主体的参与都将注定失败。由于中国的牧民主要是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发展的目标不仅应包含经济收益，更要传承民族文化和体现主体价值，所以任何发展方式都要尊重牧民的主体意愿，包括资源权益、经济权益、社会权益、语言文化权益和政治权利。

在国家层面，中国现行法律规定政府有权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但法律同样

① 近年的研究成果显示，“围封转移”后腾出来的草场一年后植被得到恢复，而三年后由于没有牛羊的啃食和牛羊粪便的施肥，按照牧民的话讲围封的草场已经“毒草（灌木）丛生”。而在围封前，当地牧民提出的如“草长出来就是让牛羊吃的”“没有牛羊的草原不叫草原”等等呼声，被认为是愚昧和落后的，没能阻挡“围封”的步伐。

② 国际草原大会编写组，《草原牧区管理——核心概念注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规定政府有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义务。当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受到冲击时，政府应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给以重新定义和定位，即实现发展方式变革。

第三节 相关研究动态

近年频发的沙尘暴和草场沙化引起了举国关注。由于内蒙古草原靠近北京，所以它的生态环境更受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为此斥巨资治理，同时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也出现了学术研究上的文化生态学转向。学界目前认识到：草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观念和制度）—草场—牲畜是草原生计不可分割且需要相互平衡的三要素。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变动，都会对系统整体产生影响，因此对草原生态的治理也应该贯彻整体论。

今日内蒙古草原生态的变化只是问题的表征。它显示出草原生态的三要素构成的稳定框架或共存关系正在被打破。本文以锡林郭勒一个牧场为例，揭示内蒙古草原近六十年的流动人口、草场围栏和种畜改良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话语，特别是现代化和现代科学在其中所起的支配作用，以此论述蒙古牧民传统知识和畜牧文化在维护草原生态平衡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一和第五章分别为前言和结论。第二、三、四章为本文主体：第二章论述现代化和发展语境下的牧场人口迁入（知青、兵团战士和周边自发移民）和为了保护当地生态环境进行的生态移民，以及这些发展活动导致的蒙古族社会变迁；第三章探讨生态保护语境下的草原围栏过程及其严重后果；第四章探讨科学话语下的种畜改良及其结果。这些领域都有前人做过很多研究，本文的文献综述按三个板块展开。综述的目的是从中汲取学术启示和创新方向。本文的最大创新点是按照民族学和人类学整体论，把草原生态三要素与主流社会在草原上推行的三种现代发展话语加以综合考察，探讨中国畜牧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 人口迁移及其影响研究

中外学界多年来的研究表明：草原生态恶化的首要因素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历史学是最早关注人口迁移与蒙古族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学科。阎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较具代表性。该书追述了十七到十九世纪的移民潮、清末放垦蒙地以及民国时期的移民运动与蒙古族游牧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作者通过分析内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社会发展，展示了大量涌入的移民对内蒙古当地民族、经济、生

态以及文化的深刻影响^①。相同题材著作还有牛建中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②，王玉海的《发展与变革——清代内蒙古东部由农向牧的转型》^③以及王建革的《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④等。

相比较而言，民族学、社会学更关注新中国建立后的蒙古族地区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动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费孝通 1984 年对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的赤峰进行了调查并写下了《边区开发之赤峰篇》^⑤。他通过对民族构成、生态状况和生产方式的调查研究指出：“汉族农业移民”是造成当地变迁最关键的因素，移民及其农耕方式使原牧区人口密度提高，经济和民族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当地生态恶化、农牧业及蒙汉关系出现矛盾。马戎教授秉承费孝通先生的“人口迁移”研究思路，通过对锡林郭勒盟呼尔其格嘎查的调查，结合各个时期的体制类型分析了各种体制下人口迁移的特点。他指出体制、人口迁移与文化交流三者之间存在清晰的因果关系^⑥。马戎的著作集中探讨了人民公社时期、文革期间汉族、知识青年和兵团战士的移入及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制”体制下的蒙古人口迁出造成的当地人与移民交流方式的变化及民族交融过程。色音教授的《蒙古族游牧社会的变迁》根据汉族移民及农耕方式进入的深浅将内蒙古各地区分为农区、半农半牧区和牧区三个类型，并选取 5 个代表性地区就人口迁移、民族构成、生产类型、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调查。以蒙地农耕面积的扩大和汉族人口的增加为突破口，阐释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化在内蒙古草原的冲突与交融过程^⑦。阿拉腾博士的《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放牧活动、家畜管理、牧草收割、农作物栽培等生产活动。它以两位牧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放牧方式的变化，呈现了牧民生活方式因生态环境退化而变化的过程^⑧。该书的重点在于对人口与环境能量交换的阐述。

生态移民是近年国家鉴于草原生态环境恶化而采取的被动性保护措施，其中也含有为提高牧民收入和改善牧民生活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包括人口向城镇迁移等。^⑨目前的生态移民研究集中在概念讨论、政策动机及可行性研究、实际效果与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现简单回顾如下：

生态恶化是政府动员生态移民的最大理由。盖志毅等人认为：中国牧区人口过多，

① 阎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

② 牛建中，《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③ 王玉海，《发展与变革——清代内蒙古由农向牧的转型》，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年。

④ 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

⑤ 费孝通，《边区开发之赤峰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⑥ 马戎，《体制变革、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一个草原牧业社区的历史变迁》，博士论文，1986 年。

⑦ 色音，《蒙古族游牧社会的变迁》，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年。

⑧ 阿拉腾，《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

⑨ 包智明，《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及若干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第 27 页。

超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导致草原严重退化,故需要采取围封和恢复植被的措施,因而需将牧民迁出。这是目前主流学界及政府一致认可的生态移民理由,也是生态政策的理论基础。^①李皓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是民族地区的首要任务,生态保护也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生态移民因而是民族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共同选择。^②皮海峰认为,少数民族发展是巩固边疆、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中国西部处在于反侵略、反恐怖、反民族分裂和节制境外反华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渗透的前沿。这里居住着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0%,共计有50多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受历史和自然等因素影响,总体发展水平滞后,因此生态移民对于该地区居民具有共同富裕、巩固边疆和保持全国稳定的作用。^③刘学敏等认为生态移民具有促进城镇化的作用,是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特殊途径。生态移民的目标地多集中在小城镇以及城市的周边地区,能为农牧业的劳动力转移增加机会。转移出来的农牧民大多会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迈出关键一步。移民户的聚居产生的聚集效应促进了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农牧民从农牧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④

侯东民的研究认为生态移民具有高度可行性:草原人口密度小,国家易于安置且能有效卸载当地人口生态压力,因而是解决贫困与生态恶化的根本出路。相对于其他治理方式,生态移民在财政上最节俭。只要国家合理调节移民政策,让牧民放弃家园自愿进行移出,就能使草原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⑤生态移民的可行性还体现在对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的研究方面。池永明认为西部生态脆弱区人口稀少,移民迁出后,生态环境能自我恢复。生态脆弱地区的人们生活因受到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自身也有迁出的积极性^⑥。

对生态移民效果的研究即有对移民政策的积极肯定,也有从民族文化保护、移民贫困化、移民迁出后续管理薄弱等方面对生态移民政策效果持保留态度的研究。

刘学敏《西北地区生态移民的效果与问题探讨》指出移民迁出后迁出地在禁牧政策配合下生态恢复良好。移民在科学技术支持下从事舍饲圈养,在不提高牲畜头数的情况下,达到了增收目的。而且由于移民聚居,促使迁入地产业结构优化,经营规模扩大,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⑦同名作者的《生态移民理论与实践研究》指出,生态

① 盖志毅,宋维明,陈建成,《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及其对策》,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55-58页。

② 李皓,《论生态移民与民族地区现代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1期,第32—35页。

③ 皮海峰,《小康社会与生态移民》,《农村经济》,2004年第6期,第59页。

④ 刘学敏,陈静,《生态移民、城镇化与产业发展——对西北地区城镇化的调查与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2期,第62页。

⑤ 侯东民,《草原人口生态压力持续增长态势与解决办法——经济诱导生态移民工程的可行性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第66—67页。

⑥ 池永明,《生态移民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经济论坛》,2002年第16期,11—15页。

⑦ 刘学敏,《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效果与问题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4期,第48页。

移民在实践过程中因为与扶贫工作结合而效果良好：调查地的社会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人民观念发生积极转变，加强了迁出地与市场的联系，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①冬日布也通过对调查地点阿鲁科尔沁旗的生态移民考察，对生态移民在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②

对于生态移民实施中的缺陷研究主要集中在迁出地的生态恢复不理想，移民的生产生活受影响、贫困化严重加剧，移民传统文化无法延续等方面。任国英通过对鄂托克旗的调查指出当地的生态移民工程并未起到真正扶贫作用，经济和社会效益不明显，迁出地的草场没有得到很好保护，从而使生态移民的意义大打折扣。移民实施中，出现了很多政策偏差，使移民的生活受到影响。她据此提出了关注当地居民“话语权”的建议。^③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不能对生态移民简单的理解为“异地安置”。这样会导致各种生态移民“工程”的盲目性和急躁性。生态移民要防止两种错误思想：一是认为牧民只要不放牧和不讲蒙语就等于放弃民族文化传统；二是认为牧区畜牧业、少数民族文化落后，因而必须加以“改造”或“放弃”。这两种思想对生态移民建设都有阻碍作用。^④杨维军认为生态移民要注意移民的民族文化变异。生态移民不仅仅是一次空间移动，更是一次文化迁徙。多数地方生态移民重视生态和经济功能，忽视了生态移民的民族文化急需保护这一现实。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既是民族延续的根本，也是移入地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因而必须作为资源和资本加以保护。^⑤

综上所述，草原生态移民的功能和效果分成两种：一种是把生态移民作为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有效举措；一种认为生态移民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产生了重大消极影响，因而对民族文化保持和传承不利。虽然文化从来都会变迁，但不能因为文化变迁发生的必然性就采取人为的、外界的手段加速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进程。国外有学者指出不是所有的发展都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提高了全民的福祉。只有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从改变社会结构的发展提高到确实增进生态移民福祉的高度，^⑥方能做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① 刘学敏，陈静，《生态移民、城镇化与产业发展——对西北地区城镇化的调查与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冬日布，《生态移民扶贫的实践与启示》，《中国贫困地区》，2000年第10期，第39—40页。

③ 任国英，《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移民的人类学思考》，《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5年第5期，第38—44页。

④ 葛根高娃、乌云巴图，《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的概念、问题与对策》，《内蒙古社会科学》（汉语版），2003年第2期，第118页。

⑤ 杨维军，《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发展对策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1页。

⑥ Debbie Dickson & Michael Webber, *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Steppes of Inner Mongolia, PRC.* *Journals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3. No.3, P.537

二、草原管理制度变迁研究

人与自然、草原的和谐共生关系向来是“游牧思想”(nomadic thought)的重要内容。^①传统的游牧的草场使用权公有,周边牧民经协商亦可进入放牧,并通过走场等游牧技巧维系草原生态,因而避免这种草场公用制度可能带来的水草资源枯竭。这种草场的公共使用权促使一些现代学者认为草原是“无主之地”,因此也就衍生出了在公有土地上每个牧民都会力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最终导致“公地悲剧”论。^②草原地区愈演愈烈的汉族移民引发的草场退化似乎能验证这些现代(西化)学者的想法。^③有学者认为赋予牧民一块草地的长期使用权就能促使牧民合理利用草场、消除过牧。草原有偿使用能改变以往“草原无主、放牧无界、草原无价、使用无偿”的局面,有助于树立“草原有价,使用有偿,建设有责”的新观念。^④这种认识最终导致了有偿使用草场以更好保护草原政策的出台,即“草畜双承包”。为了强化这一政策执行的力度,网围栏这个内蒙古草原“新生事物”因之出现并普及。^⑤网围栏不仅造成草原景观的割裂,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游牧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的关系。

目前草畜双承包制度在内蒙古实施已经二十多年。国内关于草畜双承包和畜牧业发展方向的后续研究始终有多种视角:与本文关系最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承包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承包制和休牧禁牧措施实施的经济成本,承包制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三个方面。

胡自治的《草原的生态系统服务:降低服务功能的主要因素和关爱草原的重要意义》认为,围封草场阻止了动物的移动,造成草原生态系统破碎化。^⑥被限制在围栏内的牲畜只能反复啃食有限范围内的植被,并且践踏草场,最终造成草原的退化。敖仁其则认为围封的草场造成了物种单一,草原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而改良后的优种大家畜由于食草量大,很多牧民不愿意饲养。这些都不利于草原基因资源的相对稳定。^⑦

从草畜双承包以及后来为治理退化草场而采取的休牧禁牧后果来看,牧民收入虽有增加,但与用于围栏的费用(包括购买围栏和年度维护)支出相比,得不偿失。2001

① 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 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中提出游牧思维是多样的,差异的,遵循多元的原则,通过歌颂这种“游牧思维”,旨在向总体化的思维挑战。

② G.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1968. pp1243-1248.

③ 刘艳,齐升,《明晰草原产权关系、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经济》,2005年第9期,第30-31页。

④ 徐志信,陈玉琦,《草原管理与畜牧业持续发展》,《内蒙古草页》,1997年第1期:第1—4页。

⑤ 草原围栏化之前,有些苏木或者嘎查也会围封部分草场,即可防火又能为生出过冬提供草料。

⑥ 胡自治,《草原的生态服务系统:降低服务功能的主要因素和关爱草原的意义》,《草原与草坪》,110(3):第3—8页。

⑦ 敖仁其,达林太,《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26—29页。

年开始的生态移民、政府倡导下的大规模舍饲圈养等相关政策,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牧民贫困化。^①翁浩的《金莲花开了: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记行》指出,草原围栏导致的支出增加不仅加重了牧民负担,而且深度拖累政府。截至2004年底锡林郭勒盟草原累计投入12.3亿元(相当于全盟2005年的一半农业总产值)用于恢复退化草场^②。

现实情况是:草畜双承包没能阻止草原退化,反而加剧退化。围栏费用超出牧民承受能力。一些贫困牧民无法围封自家草场,使其他牧民的牲畜进入贫困牧民的草场盗牧。^③禁牧、休牧、生态移民的实施也使很多牧民为自己在草场承包合同有效期内能否稳定的拥有草场使用权产生担忧,导致过牧加剧^④。

本文认为,迄今为止的内蒙古草原研究成果和政策,都基于一种假设,即内蒙古草原是平衡的静态生态系统。但近年带有人文因素的科学研究确认:内蒙古草原属于动态非平衡的生态系统。这方面的学者代表是达林太和王建革。达林太指出要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的自我修复功能,建立牧民合作经济,保护生物多样性。^⑤王建革认为双承包制度无法解决过牧问题,其原因是双承包和围栏化即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又阻碍牧民和牲畜移动。这种集中化是对草原生态的致命打击。^⑥

三、畜种改良研究

畜种改良在内蒙古草原上不是新生事物,蒙古草原上的土种牲畜多是蒙古民族经过多年选育后存留下来的优质畜种,适应蒙古高原的气候和生态环境。蒙古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也积累了独特的民间选育技术。新中国成立前,蒙古民族能够通过长距离游牧来创造引种和选种的机会。由国家倡导的种畜改良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民政府时期,以科技强国为目的。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曾发布《中国畜种改良之方针及具体办法》。报告中提出用过澳洲美利奴羊杂交改良我国绵羊,用外国乳用品种和肉用品种分别改良我国黄牛,引用纯种马杂交改良等。^⑦对于解放前我国的畜种改良有学者认为“我国近代畜种改良虽然之于当年极其落后的畜牧业生长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但毕竟对改良我国落后的畜群品种,提高畜牧业生产水平,缩小与国外先进高产畜群品种的差距,开了先河,指明了方向,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化畜牧业打下了基

① 康爱民,徐建中,《对牧区草原生态修复的认识与思考》,《水利发展研究》,2004年第12期,第35—39页。

② 翁浩,《金莲花开了: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记行》,《环境经济杂志》,2005年第9期,第48—49页。

③ 李青丰,胡春元,王明玖,《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环境劣化原因诊断及治理对策》,《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66—172页。

④ 宋波,张力小,《应用牧草生长—消费模型分析牧民的放牧行为:作为对政府管理行为的建议》,《草业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15页。

⑤ 达林太,《内蒙古土地沙漠化成因研究》,《草原之友第二届会议论文集》,2006年。

⑥ 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⑦ 李群,《我国近代畜牧科技的引进与畜种改良实践》,《中国农史》,1996年第15卷第1期。

础。^① 建国后内蒙古畜种改良发轫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种畜场的成立（1957年，其前身是成立于1950年的白音锡勒国营牧场）。当时的畜种改良工作以提高牧民收入，提高畜牧业产值为主要目标，并认为“人畜两旺是进入社会主义的象征”；^②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牧区实行“草畜双承包”之后，牧民放牧的单位面积缩小，市场经济的发展等都促成了新一轮的畜种改良。此次畜种改良是为“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合产业化的需要，使农牧民增产增收，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一些从事畜种改良的技术人员认为应该制止农牧民“想养什么畜就养什么畜，想留什么种就留什么种”的混乱局面；^③ 2000年前后频发的沙尘暴吸引了社会各界对内蒙古生态环境恶化的关注。为保护草原及内蒙古周边城市的环境，内蒙古各级政府开始了对内蒙古生态环境的治理，除季节性禁牧、休牧、全年禁牧及围封转移、生态移民等措施外，畜种改良也是保护生态环境努力中的重要环节。其理论基础为在舍饲圈养条件下如不增加牲畜的头数，只有提高牲畜的乳、肉产量才能增加牧民的收益，提高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当地土种的牛、羊在肉、乳兼用方面处于劣势，引进优良畜种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④

本文并非否定畜种改良工作取得的成绩及其必要性，而且从历史上看草原牧民也并不抵制新畜种，事实上现有的畜群畜种就是历史上科技创新的产物。今天的改良工作应接续历史文化、结合生态环境实际情况进行，一定要以牧民为主体，尤其不能掺杂文化歧视和偏见。现有研究对各个部分的批判因为就事论事，不够综合全面。本文基于综合分析，参照学科观点和国际视野，特别是中国倡导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基于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执政理念，提出畜牧文化研究、畜牧经济发展和草原生态保护从“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范式转型理念。

四、 本文创新点：游牧文化科技价值和生态伦理

生态困境的根源是文化困境。文化困境的原因是现代科技教育导致的人文资源贫困。全球现代化使全球的传统游牧社会受到强烈挤压，游牧者面临着干旱、行政约束、经济发展的困境及现代化的压力。随着现代交通通讯而产生的旅游业使游牧社会更多地接触到外来者。这些都加速了游牧社会及其文化的巨变。当今国际游牧研究越来越关注他们的社会变迁、文化记录等，而 UNESCO 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则把关注点集中在人权、牧民生计和人口较少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遗产等问题。草原和游牧向来是

① 李群，《我国近代畜牧科技的引进与畜种改良实践》，《中国农史》，1996年第15卷第1期。

② 齐伯益，《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0页。

③ 杨明福，白益民，《少数民族地区畜种改良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四川畜牧兽医》，1998年8月第8期。

④ 达布等，《圈养是一场革命—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变革扫描》，《思想工作论坛》，2004年4月。

中国传统“田园牧歌”不可缺少的部分，因而具有审美消费的价值。但由于近年传统游牧地区生态恶化，牧民处境日益艰难。主流社会于是开始关注失去了“牧歌”的“田园”极其导致的现实和美学困境。

游牧生计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态支柱，游牧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大传统的重要源头之一。科学发展观是带有后现代思想革命性质的新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视野下，农耕与游牧，中心与边缘不是简单的两元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关系。没有边疆民族和畜牧生计，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传统很难形成，今后的中国文化不仅会失去特色和创新性，而且会使中华民族失去精神家园。游牧与定居关系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构建中的主要旋律之一。因此对游牧文化的研究是结构性的要求，有学术传统延续的需要。

近年国内外一批在互动理论框架下研究游牧文化的成果正在推动学界对多年来游牧文化研究的反思。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有王明珂^①，李普曼^②等。他们把游牧民族及其文化置于世界体系或中华民族关系中进行分析。“游牧民族”这一名词接受了学界的反思，并推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游牧文化在时间、空间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研究。游牧文化作为边疆民族文化的代表正在成为重新思考“中心”文化并使之做出创新思考的重要支点，因而也必然是中国蒙古游牧文化研究的转型方向。

互动论框架下的蒙古游牧文化研究一开始多采用“正名”方式，即试图证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同样的源头地位。1980-90年代的“正名”研究旨在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蒙古族生态文化的合理性。本世纪以来，内蒙古草原“双权一制”的落实、网围栏的设置、大规模的生态移民、频发的沙尘暴袭击北京、台湾甚至日本和香港，从而使得游牧文化和游牧民族困境成为世界问题。全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共同关注又使游牧生态内容涵盖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层反思，进而认识到生计生态与民族文化之间互为表里的事实。今日蒙古族学者也跳出了蒙古学研究的圈子，从对于草原、文化、民族的研究转向了工业化、现代化语境下游牧民族面对自然、文化、历史的抉择的研究中，作为民族学人类学核心理念的生物—文化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生态研究的主导范式。这种范式主张把生态和生计研究放在全球化的叙事背景下进行，并将其与社会组织制度、文化模式、少数民族地位和认同研究结合起来。这些研究同时注意吸收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的方法论成果，强调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视角。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英国剑桥大学汉弗莱等《游牧文化的终结？》^③，史尼斯《变迁中的内蒙古：蒙古族牧业社会与中国政府》^④以及美国人类学

① 《《华夏边缘》及《游牧者的选择》中对华夏边界的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研究）。

② 《《熟悉的陌生人》中对西北穆斯林的研究）。

③ Humphrey, Caroline & Sneath, David. *The End of Nomadism—State,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1999.

④ Sneath, David, *Changing Inner Mongolia—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USA: 2000

家威廉姆斯的《长城之外：中国内蒙古草原的环境、认同与发展》^①。

《游牧文化的终结？》一书的主要观点为草场退化并不是载畜量过大而是由草原使用方式不当所致。作者通过比较研究中、蒙、俄三国十个田野点得出如下结论：高度流动性的放牧方式并不落后，而是一种广泛且良好的组织方式，同时也是高效率 and 专门化生产的基础。作者还认为游牧并不排斥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游牧文化中的知识和技术对于今天这个科技主导的时代具有重新启蒙的价值。该书在探讨外部政治经济制度对当地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关注牧业文化如何根据生态和社会结构采取具体的适应形式。

史尼斯的《变迁中的内蒙古：蒙古族牧业社会与中国政府》详细论述了内蒙古牧业经济生产的组织形式在不同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前的游牧社会、牧业集体化、文化大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他认为研究内蒙古牧业生产方式时必须考虑政治权力关系及其运作，并指出某些文化模式可能因为抵制时髦的生产关系变迁而存在。

威廉姆斯的《长城之外：中国内蒙古草原的环境、认同与发展》更加关注当地人的“话语”和文化。威廉姆斯 1993—1997 对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进行田野调查。该书研究了“双承包”之后的草原牧区变化，特别是政府、市场、草原科学家、西方知识分子和当地牧民等多主体的博弈角色和互动关系。作者指出很多看似合理的政策在落实中遇到重重困难，是因为政府和受现代科学话语影响的草原科学家与当地牧民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立场的不同。作者对草、沙、网围栏的解读主要体现了牧民的主位观点，包括现代科学家认为草原上的“沙地”毫无价值，甚至要用植被覆盖，但当地蒙古族却认为黄沙是活沙，沙地与草原共存的景观才是美丽的自然，对于畜牧有休息和卫生的功用。对于政府用于区分产权和阻隔交流的网围栏，牧民总是努力以各种方式跨越也具有权力冲突的痕迹。

五、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本文主要采用民族学人类学实地调查法，特别是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文献分析。笔者 2009 年 5 月到 2010 年 2 月对锡林郭勒盟白银锡勒牧场及其周边地区做了实地调查。同时参照了麻国庆^②和丁勇^③两位老师此前对白银锡勒牧场研究。实地调查的内容包括地理地貌、牧民生计方式，国家建议的草原生态定位站，白银锡勒自然保护区同时对一些生态移民点做了追踪研究。笔者深度访谈的对象包括了当地牧民、知青、

① Williams, Dee Mack, *Beyond the Great Walls—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Chinese Grassland of Inner Mongoli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2

② 1990 年代，并完成《“公有”的水与“私有”的水》一文，麻国庆，《“公有”的水与“私有”的水》，《开放时代》，2005 年第 1 期。

③ 2008 年博士论文《天然草地放牧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家庭牧场的视角》。

牧场领导，“两转双赢”模范户，生态移民户以及当地从事生态研究的科学家等。

六、 创新之处与不足

创新点一：用蒙古族畜牧传统中的“人—草—畜”三位一体理念与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级政府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采取开发移民和生态移民、草原使用和管理制度变革、畜种改良这三种政策及相关话语的关系来构架论文。本文的主体部分基于一个国营牧场的人口变动折射出草原的人口流动，用草原景观变化折射制度变革的后果，又用种畜改良的不断失败来呈现科学话语的局限性和霸权性。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畜牧文化的重新认识来推动中国主流社会对待少数民族文化认识的观念更新和政策创新。

创新点二：本文在民族学人类学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指导下，综合前人成果而体现了以人为本即以文化为本的整体论研究视角，既综合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政策研究成果而又为人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所用。

创新点三：借鉴西方绿色运动中形成的大地伦理学和《联合国人类文化多样性宣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对草原自然生态的敬意和游牧传统的尊重，从而支撑了本学科倡导的中国文化创新方向：即“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

本文的不足之处：

1. 由于学科背景局限，本文对蒙古民族和游牧生计的历史经历和成就陈述不详，从而影响读者对畜牧生计长时段大范围发展全貌的理解和把握。

2. 由于内蒙古草原近百年来处于持续的政治经济体制变革中，所以微观层面的（包括本文重点描述的国营牧场）建制资料流散较多，所以较多地依赖于《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和《白音锡勒牧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从场部资料室得到的近年来的工作总结、汇报材料等和个人深度访谈，同时参考了国内关于生态移民、畜牧业现代化和种畜改良方面的论文及各级政府的政策、公告等。但这些资源的关键部分既统计数据失之薄弱。

3. 本文试图用宏观的文化生态学方法来探讨草原困境出路，试图融合草原及畜牧业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人文价值关怀，但由于专业知识不足而可能有失偏颇。这些不足也是笔者今后研究的改进方向。

第二章 移民与发展：白音锡勒牧场的人口流动与发展

第一节 白音锡勒牧场简介

一、地理环境

白音锡勒牧场位于锡林郭勒草原中部、锡林浩特市东南 55 公里处。地理坐标为北纬 $43^{\circ} 20'—44^{\circ} 08'$ ，东经 $116^{\circ} 04'—115^{\circ} 05'$ ，北与毛登牧场毗邻，西与锡林浩特市、达布希勒特苏木和贝利克牧场接壤，南与白银库仑牧场，东与西乌珠穆沁旗和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交界。

全场总面积 3,730 平方公里，其中草原 3,203 平方公里，耕地 244,905 亩，林地 98,430 亩，水面 90,000 亩。草原占总面积 80% 以上。

当地年平均温度 -2°C ，日平均气温 $\geq 10^{\circ}\text{C}$ ，无霜期 90--110 天，平均光照日数 2,673 小时。年平均降水量 350—450 毫米，70% 集中在夏季，积雪期 200 天。境内锡林河纵贯中部 80 公里。年平均径流量 0.23 亿公方，其支流有好来吐河，倡图河等。牧场有泉水 18 处，大小湖泊 11 个，其中扎格斯台湖水面积 1.68 平方公里，容积 220 万平方。

据中科院草原研究中心统计，当地草原资源丰富，有种子植物 650 种，天然一等草场约占 49%，二等草场约占 43.5%，三等草场约占 7.5%。

场部境内有云杉林木 800 棵，有些云杉的树龄达百年以上。1985 年“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其核心地带在白音锡勒牧场境内）成立以后，云杉林成为保护重点。牧区交通、通讯、能源条件良好。纵穿总场部和五个分场的 303 国道于 1998 年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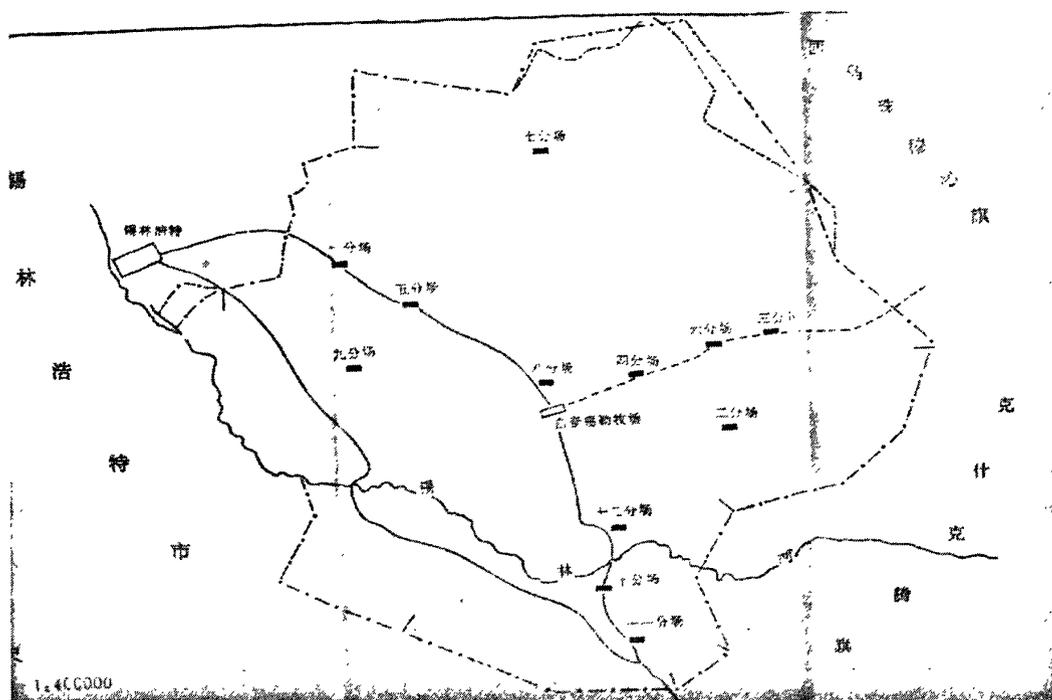


图 1-1 白音锡勒牧场略图

二、牧场简史

新中国成立之前，种畜场对草原蒙古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从 1953 年之后短短七年间，仅锡林郭勒盟就建立了 14 个国营种畜场，其扩散速度之快、规模之大都要归因于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种畜场即锡林郭勒种畜场及其运行模式的示范作用。

《锡林郭勒盟畜牧志》介绍：“锡林郭勒盟农垦事业的创立以内蒙古自治区决定建立锡林郭勒种畜场为标志。种畜场的建立成为锡盟农垦事业和畜种基地建设的起点。”^①

笔者从 2009 年 5 月到 2010 年 1 月对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做过数次调查，试图找到建场资料或《场志》，但结果都是“文革中丢失”。锡林浩特市档案局工作人员解释说，由于近年白音锡勒牧场划归锡盟农垦局，锡林郭勒种畜场建厂资料及该厂在文革、军垦时期的资料也一并交至农垦局，几年前锡盟农垦局解散后所有材料移交锡林浩特市档案馆，部分材料现还在整理之中。因此我对白音锡勒牧场历史部分的介绍仅是零星文件的梳理和汇集。现有的文件陈述锡林郭勒盟种畜场成立目的如下^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垦事业，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的。它是党中央为巩固边防、捍卫和建设祖国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

① 齐伯益，《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3 页。

② 下面部分内容改编整理自齐伯益主编的《锡林郭勒盟畜牧志》。

锡林郭勒盟农垦事业的根据是内蒙古自治区 1949 年施政纲领。该纲领决定在呼盟、锡盟建立畜种供应国营牧场。当年，内蒙古农牧部畜牧处处长阿民布和^①根据自治区党委决定，带领四名干部八名工人，长途跋涉到锡林浩特，在锡盟领导支持下抽调干部职工、购买畜种、在锡林浩特南部古乃庙、好日图庙、布里亚特庙一带，勘察选址，最终于 1950 年 10 月 1 日建起锡林郭勒种畜场。作为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第一个国营牧场，建厂之初，全场仅有 20 名职工，1033 头（只）大小牲畜，两项蒙古包，三辆胶轮车和一台马拉四轮车。

畜种厂的建立是锡盟农垦事业和畜种基地建设的起点。国营种畜场、牧场的基本特征是企业性（讲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全民性（国营主导）和社会性（企业要办学校、医院、交通、通讯、社会福利、文化事业，自行负担社会性建设任务，而这些在农村牧区是由国家建设负担的）。

国营种畜场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农牧业生产；按照国家计划提供农畜产品和工业原料；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以先进农牧业生产技术、机械化技术、优良品种和经营管理经验，向农牧民示范，引导农牧民走集体化、机械化生产道路。

1958 年乌兰夫到该厂视察时，希望各族职工继续努力，把它建设成为畜种基地、畜产品基地、机械化饲草料基地和培养农牧业人才的基地。

1969 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并在锡盟组建第五师、第六师，对国营锡林郭勒种畜场和周边的茅登、高力罕牧场和乌拉盖牧场等地实行军垦，组建了 31 团，32 团，41 团和 52 团。

1975 年 10 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改，取消兵团建制番号，五师、六师所辖各团改称白音锡勒牧场、茅登牧场、高力罕牧场和乌拉盖牧场等。

1984 年 10 月，内蒙古党委办公厅 1984（19）号传真电报通知：锡盟所有公私合营牧场（包括已改为国营牧场的）改为苏木或生产队。体改到 1985 年，锡林浩特农牧场局统辖 8 个牧场，其中包括白音锡勒牧场和三个种畜场：五一、黑城子和额里图种畜场。

此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鼓励全国农区实行以户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白音锡勒牧场也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实行了草畜双承包。

① 关于国营种畜场的创始人阿民布和，在《锡林郭勒盟畜牧志》第 1338 页有简短记载。阿民布和（1902—1973），蒙古族，内蒙古巴林右旗人。1910—1922 年念私塾；1923—1925 年在家乡种地；1926—1943 年曾先后在蒙疆军队担任连长、副团长等职；1945 年 4 月在沈阳陆军学校受训；1946 年 3 月参加东盟政府政变委员会，任第四师教导团长；1946 年 5 月到 10 月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蒙汉联军司令部参谋长，后任第四师师长；1949 年 4 月调内蒙军区司令部，同年转业到内蒙政府农牧部任处长；1950 年受内蒙政府委派到锡盟建立种畜场至 1966 年 11 月。阿民布和白手起家，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建起了第一个国营农牧场，并建成现代草原研究中心，成为全国十大样板之一。1966 年，阿民布和文革中受到批斗，1973 年含冤去世。

第二节 白音锡勒牧场的人口流动

人一草场—牲畜是草原生态中缺一不可且相互制衡的三个要素。本文顺序讨论“移民与发展”、“草原与体制”、“科学与权力”三个主题。学界通识认为：人是生物圈的最高消费者，人口因素通常被认为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人口问题是社会—文化—经济—自然复合系统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以“移民与发展”为起点透过白银锡勒牧场的人口变动探讨内蒙古草原上的发展问题。

一、人口迁入及后果

《白音锡勒牧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反映了白音锡勒牧场人口的迁入情况。在全场 3597 平方公里地面上，人口从 1950 年的 20 人陡增到 1990 年的 10201 人（其中最高峰为 1982 年 12959 人），增加了 510 倍。牲畜头数由建场初期的 1022 头发展到 1990 年的 241600 头（只），增长了 236.4 倍。详情见下表：

表三 人口与职工统计

年份	总人口	总户数 (户)	全部职工	牧业工人	非牧业工人	畜牧业工人	非牧业工人	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服务人员	其他人员
1950	20										
1951	166		35								
1952	204		82								
1953	324		141			23		30		10	31
1954	473		184			45		15		14	33
1955	625		404			111		39		19	58
1956	6139		2211			593		57		57	243
1957	6992		2613			1119		51		52	267
1958	10130		4661			1740		59		53	381
1959	12777		4718			845		54		54	384
1960	12959		4745			867		44		48	374
1978	11754		4878			1482		44		44	355
1979	12105	2205	4918			1241		46		46	357
1980	12271	2393	4125			1147		47		47	359
1981	11577	1877	4022			1155		47		47	359
1982	12959	2214	4185			784		47		47	359
1983	11414	2830	4677			1664		47		47	359
1984	11726	2614	4677			1320		47		47	359
1985	11494	2578	4528			1545	319	47		47	359
1986	11994	2141	4591			1657	392	47		47	359
1987	10980	2420	5651			2124	31	47		47	359
1988	11422	2385	5346			2781	415	47		47	359
1989	10215	2247	5277			2654	451	47		47	359
1990	10201	2241	5580			2416	485	47		47	359

图 1-2

阶段性人口变动的原因：

1. 上表显示，1957—1965 这八年是人口流入的第一个高峰。牧场人口从 829 人增加到 6992 人。除从各地调入和有计划性的移民外，多为内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流民。1959—1960 年，牧场接收了全国各地（主要为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

流入人员约 1300 余人。这些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习惯和文化传统。由于人口激增，造成粮食压力，大面积草原被开垦成农田（参见牧场播种面积及亩产统计表）。

2. 1965—1975 年是内蒙古发展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时期，是牧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1967 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5 师 31 团成立并接管白音锡勒牧场后，仅 1968-1972 年就接收了来自北京（12）、天津（292）、河北（178）、辽宁（49）、内蒙古（1327）以及其它省市（102），总计 1960 名知青。

3. 牧场人口的最高峰为 1982 年，达到 12959 人，随后开始下降。下降原因包括知青返回原籍（现在留在牧场的只有一对知青夫妻），以及部分人口调出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知青大量返城并没有使牧场人口骤降，说明当时牧场或有大量未统计的流入人口。

4. 人口增长对农牧业结构的影响。人口增长给白音锡勒牧场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都带来巨大变化。

牧业：压力增大。建场之初的小规模农业基于“农业的经营为牧业服务，即为牲畜提供必要的饲料”。但随着人口增加，白音锡勒牧场不得不以解决吃饭问题为中心，不仅没有达到农牧结合的目的，还引发了农牧矛盾如争地等问题。

农业：1953 年牧场农业开垦仅为 85.5 亩。1957 年播种面积达到 20970 亩。四年间人口增长 40 倍（从 20 人增加到 825 人），播种面积更增长 246 倍。到 1980 年前，牧场耕地达 21.3 万亩，播种面积最多时达 12 万多亩。1980 年以后退耕还牧。1990 年耕地减为 164800 亩，播种面积减为 91740 亩，但亩产波动极大，常年维持在 50 公斤以下。在干旱草原不适合农耕的气候条件下，这种粗放的低效率的农业开垦造成牧场生态恶化，沙化加剧，从而制约了牧业的发展。

表 1-1 牧场播种面积及亩产统计表^①

年份	总播种面积	亩产(公斤)	年份	总播种面积	亩产(公斤)
1953	85.5	46.8	1981	109321	43
1957	20970	69.4	1982	118255	88
1962	73867	35.2	1983	103900	53
1965	72666	44.2	1984	96357	63
1970	112272	70.7	1985	90619	54
1975	113852	54.3	1986	82100	37

① 本表根据《白音锡勒牧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附表五《农业统计》制成。

1976	116127	42.3	1987	77500	46
1978	109330	51.6	1988	80300	29
1979	96357	73	1989	78800	53
1980	95354	32.9	1990	83700	66

生态：人口流动带来了草原景观改变。居住格局就是一例。今天外人走进白音锡勒牧场，首先看到的是连片的定居房屋。这与白音锡勒牧场是农牧业企业这一特定性质有关。牧场实际是农牧业企业而不是纯粹放牧。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汉族移民增多，草原牧区套用农区的做法，在水源地附近建起大批定居点^①。

传统游牧社会的居住格局有利于草原和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牧场这种似农区的居住方式对牧区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例如，中科院草原生态定位站就建在牧场的12分场附近。笔者曾在此住宿，锡林河是流经当地的主要河流。当地老人说，聚居地周围草场的上牧草由原来的1米多高变为现在不到1尺。很多地方沙土露出地表。问到当时“怎么放牧”时，现在还留在牧场的知青告诉我，“羊怎么胖，怎么放”。这就与当地（老）蒙古族牧民传统的放牧方式不同。《锡林郭勒盟畜牧志》记载，“羊的放牧方式有一条鞭式（一字纵队排开）、满天星、前挡后让等方法，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根据草场、水源的实际情况综合使用”^②。而“怎么胖，怎么放”的方式，在当地被老牧民笑称为“兔子羊”。它会对水源和居民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破坏程度会随居住地和水源地的远近而不一。

白音锡勒牧场的人口迁入在内蒙古的现代移民史上具有代表性。根据美国学者史华慈研究，在建国之初的十年里，人口密集地区的大批农民流动到人口较少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即西北和内蒙古地区（只有少数流动到了西南地区）^③。这些移民不论是出于政府组织型经济或政治移民^④还是周边省区农民（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自发移民，都对白音锡勒牧场生态造成了巨大冲击。人口增加、牲畜增加，加之不同时期的政府相关政策的失误，致使草场耕地的生产力下降、草地退化、水资源短缺、沙化严重、草地再生能力减弱、草场生态失衡。目前退化草场已达20%以上。据草原生态定位站对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的草地生产力的监测，草地产草量已由先前的

^① 麻国庆，《“公有”的水与“私有”的水》，《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第12页。

^② 齐伯益，《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2页。

^③ Schwartz, Henry. G., *Chinese Migration to North-West China and Inner Mongolia, 1949-1959*.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6, pp. 61-74. London.

^④ 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根据潘鸣啸的分析，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分类共有四种：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除社会差别）；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出于战略考虑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200—300斤/亩，减到目前100—125斤，降低约40%。

二、人口迁出

白音锡勒牧场人口经历两次外流：一是1982年后的知青返城（这一数目很快被非计划流入人口补充）；二是2000年后，生态环境恶化，政府开始采取治理措施。1999年特大沙尘暴袭击北京，中央政府震动。各级政府与此同时开始为中国承办绿色奥运做准备，并治理华北沙漠地区以及内蒙古草原。内蒙古自治区2000年开始实行生态移民工程几乎覆盖自治区所有盟、市。位于锡林郭勒草原中部的白音锡勒牧场，也因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导致了部分职工被“生态移民”。

笔者认识的第一个生态移民搬迁户叫比杰，与他的相识非常偶然。2009年5月，笔者从白音锡勒自然保护区调查返回场部途中发现一处居民点，由八户新建的砖瓦结构房屋构成。这里呈现了与笔者借住的十二连截然不同的景观。十二连的住房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建成，房屋及院墙均为土坯结构。兵团战士撤离后，成了场部职工宿舍（见下图1-3）。虽已历经四十年，大多数居民仍未翻新，房屋前后排之间为沙土地，路面上及各家各户院落内没有牧区常见的牛粪燃料。多数人家房后即是自家围封好的草场（见下图1-4）。如果没有草场、网围栏和牲畜，该居民点整体景观与中国北方大多数农村无明显差异。



图 1-3



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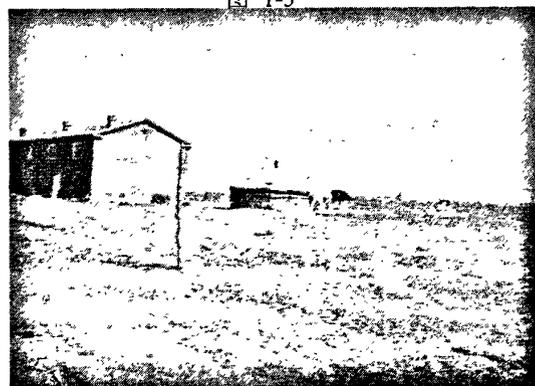


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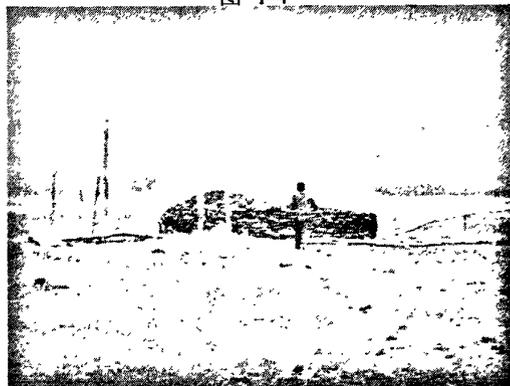


图 1-6

白音锡勒保护区旁边的定居点则是清一色的新砖房（见图 1-5），内部规划整齐，共有住房八套^①，每套住房均由正房、院落和用于舍饲圈养牲畜的后院构成。定居房前矗立着新打的井，井的一侧连着供牲畜饮水的水槽，井旁堆放着做燃料的牛粪（图 1-6）。吸引笔走进比杰家的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这个定居点中唯一的住户，还有他搭在定居房屋旁的蒙古包。推开蒙古包低矮的门，包内摆设极其简陋，只有必需的生活用品，包内唯一的柜子正中间供奉着成吉思汗像。

比杰告诉笔者，这是场部修建的生态移民定居点，他是目前定居点中唯一的牧户。移民前，他和家人在二分场附近放牧。他放牧的牧场距离白音锡勒自然保护区非常近。比杰及其父母是世代放牧、居住在这里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招工到原锡林郭勒国营种畜场成为国家工人。现在还生活在白音锡勒牧场的蒙古族职工多属相同情况。种畜场时代、人民公社时期直至将草场包产到户之前，他们在牧场的身份为牧工。当年牧业生产由集体统一管理，什么季节到哪里放牧都有负责牧业的领导决定。这些领导通常也都是放牧经验比较丰富的牧民出身，对周围草场的分布、当地气候情况非常熟悉。放牧的单位通常是两到三家。各家的分工遵循一家负责白天放牧，另一家负责晚上守夜（防止其他野生动物袭击、防盗以及观察畜群有无异常等）的原则。当时虽是定居放牧，但牲畜仍然能在小范围内移动（小游牧），草场条件还能维持牧业生产。1978 年以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带动下，白音锡勒牧场实行了后来全区普遍实行的草畜双承包。出身牧民家庭的比杰与其他老牧民一样，认为承包后前几年收入虽然增加，但是草场却越来越差。问到他认为草原生态环境这些年为什么持续恶化时，他说：“人太多了。而且一种地这草就不行了，再也好不了了。现在又有了库伦（蒙语中“墙”的意思，他始终不知道用汉语怎么说这种铁丝织成的网围栏），走不了了。反正啊，牲畜舒服了，人就不舒服；人舒服了，草场就好不了”。问到为什么搬到这里时，他说“场子里要把保护区围起来，我们离那近（白音锡勒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就生态移民了。再说那的草也实在不行，牲畜都吃不饱。”为什么这个移民村里只有他一户人家？他说“这个（定居房）住着不舒服，再说把牲畜圈起来养，饲料太贵了。这个品种不行，太娇气还太能吃，现在又不让走（场）了。还是以前那个土牛、土羊好。这个地方（移民点）也不是没有人住过，后来又都搬走了。”

三个月后笔者再去牧场调查时，专程到移民点去看他，发现他也已搬迁，蒙古包不见了，房前的水槽干了，只剩下他住过的定居房孤零零地矗立在前往自然保护区的路边，周边草场地表裸露，草原夏日的风掀起一阵阵黄沙。

笔者后来打听牧民比杰离去的原因，收集到三种说法：生态移民说，保护核心区牧民搬迁说及市里要求转移人口说（即“两转双赢”政策）。厂部领导后来谈到，像比杰这样离开白音锡勒牧场的职工已经占到职工总人数的 1/3。虽然无法得到牧场现有人口最新统计资料，但仍能听到当地牧民、职工说“这里的人没怎么见少”。驱车

^① 后经与场部领导访谈核实，此八户人家为一组，周围用于生态移民居住的住房共三十户。

从锡林浩特市前往白音锡勒牧场的途中，“阿拉伯纯血马厂”的巨型牌匾赫然矗立在303国道旁。人们纷纷下车、骑马、拍照。当笔者问及马厂的马信为何还有这么大的草场放马时^①，回答是由于草场划分后，有些职工草场太小无法放牧^②，就把草场租出去，自己进浩特（锡林浩特）打工了。河北唐山来的老板把这一片的草场都租下来办了马场。问到这些阿拉伯纯血马从何而来时，马信说军马厂倒闭，牧场的职工又不愿意承包这些当年花巨资引进的改良马，就作价卖给了外来商人。

不论是白音锡勒牧场成立之初的人口大量迁入，还是生态恶化之后牧民的被迁出以及新移民的再进入，都有着共同的运行主线：发展。发展一词的含义非常模糊，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下，体现在不同的群体中就有不同含义。那么白音锡勒发展乃至内蒙古草原近年来的发展属于哪一种发展？经济的发展是否应该成为内蒙古草原上发展的最终目标呢？

第三节 哪种发展：生态移民还是“经济”移民？

一、发展理论的沿革和本质

从1980年代前的“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特别是邓小平1990年代初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以来，“发展”成为中国各界最为认同因而使用率也最高的词。事实上，西化含意太重的“现代化”渐退以来，发展也是各国用来填补“现代化”空间的标准词语。但在在不同的语境、专业背景和目的之下，发展有着然不同的含义：

发展是一个非常模棱两可（ambiguous）的词（Dickson & Webber, 538）^③。

发展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概念，是观点的集合（加德纳，11）^④。

而Gustavo Estev在Wolfgang Sachs编著《发展字典——作为权利的知识引论》一书中并没有给“现代”意义上的“发展”一词下定义，他认为发展所针对的是某种不发达状态，并追述：

1942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总干事在撰写关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时，首先使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含义上的“发展”（即“不发达”的对应词）；而使现代发展概念深入人心的则是由于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在1949年1月在他的就职演讲中的表述：

① 马作为草原上的大型牲畜，由于食草量大，活动范围广，在草原围栏化的情况下，数目锐减，“迅速走向消亡”详见《人与生物圈》2007年2月刊“蒙古马”专辑。

② 按照白音锡勒牧场的规定，每个牧场正式职工可以分到550亩草场，家属225亩草场。人口少或者职工少的人家由于分到的草场过小，无法从事畜牧业生产。

③ 摘自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Steppes of Inner Mongolia, PRC,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3, No.3, 第537页，由本人翻译。

④ 蒂·加德纳，《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We must embark on a bold new program for making the benefits of scientific advances and industrial progress available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growth of underdevelopment areas.

...The old imperialism—exploitation for foreign profit—has no place in our plans. What we envisage is a program fo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democratic fair dealing.^①

据此，发展诸多含义中至少有一层可确定：即从所谓的欠发达——这种不体面状态——下解脱出来（原文为 development has connoted at least one thing: to escape from the undignified condition called underdevelopment）。^②

加德纳在《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认为：发展理论是一系列观点的集合，而现代化理论是其核心，并至今主导着诸多发展理论。他引用了福斯特在《农民的侠义利益观》中的观点认为：在本质上，现代化是一种进化论思想，它以工业化、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及都市化为依据，认为所有国家都处于一个直线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阶段中，并最终将成为一个工业化、都市化与有序的社会。现代化理论特别强调经济与道德性，认为现代发达国家是世俗的，普遍受利益驱动，而不发达国家则处在传统之中，具有特殊性，并且不为利益驱动^③。

加德纳认为最成功地阐述现代化理论的是经济学家罗斯托。罗斯托将北半球经历的增长过程看作是世界上其它地方都要经历的模式。他认为，虽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所有社会都在向相同的方向移动。传统社会是贫穷的、非理想的及乡村化的。其经济需要在技术与高投资的基础上向前飞跃，而飞跃的前提是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的发展及有效的管理。当这些社会步入成熟阶段并能够独立发展时，技术就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中，最终进入高消费、高生产与高工业化时代。据此，许多新独立国家相信发展会到来，并雄心勃勃地制定了许多五年计划，如印度和巴西等。

除上述非常具有“现代性”（社会进化论）含义外，也有不乏温情的描述：

发展可以分为作为结果的发展与作为社会过程的发展。前者以提高人民社会福祉为目的（Development, deliberate upper class, the concept refers to an outcome—improved well-being for people）；作为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发展（development, which refers to a process and it is a means through which social structures change）。^④

尽管目前还没人能给这个当今最流行做出普世认可的定义，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① Wolfgang Sachs,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7.

② Wolfgang Sachs,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7

③ 凯蒂·加德纳，《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④ 摘自 *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Steppes of Inner Mongolia, PRC*,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3, No.3.第537页，由本人翻译。

1979年在厄瓜多尔召开的基多会议提出的发展概念似乎最有人文科学性，因而最值得今日中国人记取：

对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而言，这个概念所表示的发展是各自体内资源的运用。它的基本含义是：应注重理应受到尊重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不仅仅是能够精确计算的经济价值体系。这一概念证实了一个秘而不宣的真理：若没有与发展休戚相关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若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在空头支票的掩饰下对他们进行剥夺，发展就不可能发生。

二、“两转双赢”之人口转移

（一）生态移民

白音锡勒牧场的早期人口迁入具有计划性和规模大的特点，其动机既有政治的考虑，也有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如今，特别是2003年之后的移民却有着前所未有的动因：以保护城市生态为目的的环保努力。从此，白音锡勒牧场的移民就都叫做生态移民。这个在中国北部贫困地区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术语，最先出自宁夏的吊庄生态移民。但其大规模实施却是2000年国家开始西部大开发之后，尤其是为北京举办绿色奥运而治理沙尘暴的努力中。生态移民的内容很多：包括把内蒙古阿拉善盟草原的牧民迁往外地；把中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从大兴安岭深处移到根河市郊区等。需要指出的是，官方在这项环境配套政策实施九年之后，也没有给生态移民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因此，九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生态移民也就没有权威的官方统计数字。社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曾经在2005召开过《生态移民国际论坛》，与会专家对于中国现行的生态移民政策的内涵、动因及覆盖群体意见不一：

1. 生态移民内涵和分类。郝时远认为，生态移民自古有之，但现代社会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的观点加以概括并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影响到政府的行为，即国家为保护生态而通过政策进行有组织的移民。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自然灾害、战乱、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也有政府移民戍边、屯垦戍边原因产生的移民。这些移民也与生态直接相关，只是我们目前在资料的发掘和整体线索勾勒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弱点，所以它的呈现不如现在清晰。郝时远指出，由于生态移民被定位于生态环境及其所引起的问题上，因此生态移民属于移民研究中的特殊类型。同时，生态移民研究与地理学、环境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相交叉，任何单一学科的学者都很难对其做出全面科学的阐释，故它属于一个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课题。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建军认为，生态移民是指为消除贫困、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把位于生态脆弱区或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向其它地区迁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生

生态移民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调整。她指出,按移民的迁出地和迁入地,生态移民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从迁出地来说,生态移民分为生态脆弱区移民和重要生态区移民。生态脆弱区包括极度干旱、半干旱或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地区;重要生态区主要指江河源区、生态屏障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可以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尽管学界对于生态移民的内涵尚无界定,但一般认为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行为,即把位于生态脆弱区或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其他地区迁移,以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实践活动。二是指主体,即那些在生态移民实践中被转移出来的农牧民。

2. 生态移民动因。前述关于生态移民的内涵探讨已经涉及到动因。郝时远认为导致生态移民的主要动因概有:(1)生存条件恶化,包括自然条件本身不适合人类居住,如严重干旱和缺水,也包括人为活动造成的草场退化和土地沙化等;(2)生态环境与环境治理,如自然保护区内生物的多样性;(3)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如水利、电力资源的开发;(4)古迹文物保护等。

杜发春(社科院民族所副研究员)认为,现行生态移民的动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生态保护型移民,即为了特殊环境保护需要而从保护区的特定区域移出居民。二是生态恢复型移民,即将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居民迁移到适居地,以恢复原住地的生态条件,如西北部分地区实施的移民项目。三是资源开发型移民,即基于资源开发(包括自然资源开发、旅游资源开发等)的需要而从项目实施地区移出居民,然而,鉴于开发性移民的目标是经济利益为主导,所以不能将其与生态移民相混淆,更不能借口解决开发区的贫困问题粉饰开发行为的正当性,如近两年云南的怒江建水坝之争就是典型案例。

王朝良(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则以宁夏“吊庄移民”为个案,分析了生态移民的动因主要来自于环境的恶化和易地扶贫两方面。他说,中国生态移民在1980年代初期与异地扶贫相伴而生。198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因生态环境的极端恶化,致使当地的部分回、汉居民无法保障正常生活,被中国政府确定为“特困地区”,当地居民在国家的组织下被迁居外地,实施移民。这一以扶贫为目的的移民政策,自1980年代中期后被引入到甘肃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和河西走廊地区,进行区域综合性扶贫开发。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易地扶贫也随之得以推进。大部分省区都进行了以反贫困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的易地扶贫试点,尤其是宁夏、内蒙古、云南、贵州等自然条件较差、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的西部省区,移民数量相对较多。^①

^① 关于生态移民内涵和动因分析的内容是由2005年“生态移民与环境影响评估国际研讨会”的会议纪要整理改编而成。在此向提供会议纪要资料的杜发春副研究员表示感谢。

（二）“两转双赢”之“合理”性

1. 何谓“两转双赢”？时隔十年之后，在内蒙古乃至全国，广泛实施的生态移民政策在内涵和动因上仍无法达成共识，锡林郭勒盟实行近七年的“两转双赢”政策，在概念、内容和阶段目标上亦无官方文件说明。对外公布的“两转双赢”工作，其实质内容为：转变生产方式、转移牧区人口、保护草原生态、增加牧民收入。2006年11月27日新华网报道了锡林郭勒盟实行两转双赢的情况^①：

两转双赢和谐发展 锡林郭勒盟生态经济探索之路

……三十多年来掠夺性的经营，埋下了生态灾难的祸根……对于牧民来说，草原就是命之所系。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直接受益者也是牧民……锡盟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长期的战略目标，毅然提出“两转双赢”，即通过加快转变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和转移农村牧区人口，努力实现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和增加牧民收入的目标。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上打响了。

转移农村牧区人口……从生态角度看，只有牧区人口减下来，牲畜数量才可能进一步降下来，使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正向演替。锡盟一位有心的领导算了一笔经济帐：锡盟地广人稀，近20万平方公里草原分布着20万出头的牧民，每转移出一个牧民，就相当于有效缓解1平方公里草原的生态压力。转移牧民，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好办法。2001年，在经过充分的理论论证后，“围封转移”政策正式施行，第二年，大规模的移民工程拉开了序幕。

所谓“围封转移”，就是把生态极度恶化地区的农牧民搬迁到具备一定生产生活条件的城镇周边，从事新的生产活动。在移民户原有草场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实行围封禁牧，给草原以休养生息的空间和时间。

这一政策一方面使得大面积的草原得以喘息，另一方面使得牧民摆脱了世代对传统畜牧业的依赖，跳出“一产”的圈子，从事第二、三产业，并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为了保证移民“迁得出，稳得住，富起来”，锡盟在用好用足国家项目补助资金的同时，千方百计克服财力上的困难，不断加大移民搬迁的投入。另外，他们还通过制定户籍、就业、子女入学、社保、医疗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致力于打破城乡壁垒、体制障碍，鼓励和引导农牧民进城就业创业。三年来，锡盟通过生态移民工程、扶贫移民工程和优惠政策引导，累计向城镇和二产业转移农牧民5万多人。

通过“转变”和“转移”，这场锡林郭勒保卫战初见成效，开创了草原历史性的嬗变。“两转双赢”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态的好转，牧民的理念、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围封了草场转移出来的牧民通过发展奶牛、肉牛或务工、经商，不仅使草场得到了有效恢复，他们还在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开始了生活质

^① 节选自：http://chinaneast.xinhuanet.com/2006-11/27/content_8622393.htm

量的不断提升。

内蒙古正镶白旗外宣网更以“‘两转双赢’——发展的真理和方向”为题报道“两转双赢”工作进展情况^①。2007年5月锡林浩特市白银锡勒牧场的“两转双赢”详细汇报也谈到了牧场转移牧区人口的工作：

……根据市党建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为扎实有效地推进牧场“两转双赢”工作，白音锡勒牧场把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与转移牧区人口结合起来，作为全场畜牧业生产的首要任务，统筹运作，努力开拓实现“双赢”目标的新途径，扎扎实实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汇报如下：

白音锡勒牧场人均占有草场面积只有300多亩，全部人口都集中在有限的草原上单一地发展畜牧业，已不能满足广大农牧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因此，牧场把转移畜牧业人口作为实现“双赢”的长远性和根本性措施，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一是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牧场成立了人口转移办公室，专职负责全场牧业人口转移和转移人口的再就业工作……二是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动员草场相对较少的牧户，从有限的草原上撤出来，进城务工经商、自谋职业，并有组织地进行劳务输出。根据初步统计，几年来，全场进城务工或自主创业，实现转移人口再就业达上千人。2006年，全年转移人口283人，流转草场9.8万亩。三是大力发展奶牛养殖和獭兔养殖业，使畜牧业人口能就近转移就业……建立了奶牛村，目前全场已有143户牧户从事奶牛养殖，基础母牛达到了980头，为支持牧民养殖奶牛，牧场专门为奶牛养殖户按每户15亩，每头奶牛3亩划拨了高产饲草料基地，解决了奶牛饲草需求，降低了奶牛养殖的费用。转移牧民发展獭兔养殖业，也是个很好的选择，一分场牧民刘同伟，处理掉了牛羊，围封了自家的草场，发展獭兔养殖，目前已有基础母兔50只，2006年总收入达到了1.5万元，为转移牧民带了个好头。^②

2. 在对发展理论进行回顾、对国内实行的生态移民若干问题的澄清的基础上，对锡林郭勒盟实行“两转双赢”有以下几点分析和讨论：

(1) 何种类型的移民。近些年（尤指2003年以后）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移民属于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并重的混合目的型移民。“两转双赢”最初是以恢复草原生态为主要目的的“围封转移”的形式出现的，其主要内容为“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两转双赢”中提到了“提高牧民收入”。在与一位锡

^① 详细内容见 www.nmgzxbq.gov.cn/news/manage/news/news_show.asp?id

^② 关于在锡林郭勒草原从事养殖业（除牛羊等蒙古族传统生除外）的讨论见第四章。

林郭勒盟当地负责移民的地方官员探讨牧民是否愿意移民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移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牧民变得更富有。现在他们养牛、种庄稼，这些会让他们发财致富的。人们从一个穷地方搬到一个好地方来，现在感到非常高兴。”^①

可以推断“两转双赢”工程在最初设计时就存在发展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两转双赢”而迁移牧民的行为兼具生态移民和发展移民的双重性质。

(2) 移民后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后果分析。被迁移牧民本人被迁移前对于嘎查中谁会被迁走？迁往何处？如何补偿？迁移后从事什么样的生计方式了解很少。移民前，大多数牧民认为移民后土地使用方式可以自主决定，而根据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文化、环境和贫富程度”决定个人选择。他们认为文化因素在蒙古族选择土地利用方式上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在通过对位于呼和浩特市郊区的移民村-新优佳养殖场的调查中，土地利用方式在移民和基层官员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移民多数认为自己是牧民，习惯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从事畜牧业）；而负责管理移民的地方官员尽管也认为文化很重要，但更倾向于认为土地的利用方法应该以经济为导向，文化和民族不是决定性因素，他们说“那些牧民不想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还想做牧民。但是现在谋生要比延续老一代的生计方式更重要。”^②

这种对文化先认可转而否定的做法反映了当前各基层政府提倡的发展的前提是以收入来衡量的，而不是广泛考虑人民的福祉。在没有认识到内蒙古地区土地利用方式、民族文化和环境退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认为畜牧业是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其不符合有利于农业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不鼓励畜牧业的发展。贬低畜牧业的发展意味着对那些实践畜牧业的人的指责，而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蒙古族，这些人在内蒙古自治区这个最初以牧业立区的民族自治地方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3) 移民后生计方式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化。草原和蒙古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上文中对移民后丧失对土地利用方式的自主权及因文化因素选择土地使用方式已经被经济效益好坏决定土地利用方式所取代的分析，可以推断出“两转双赢”中的部分移民行为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进行的。而一些牧民在被移民后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继续从事畜牧业，成为城市里没有“现代”技术而只能出卖体力的劳动力，这样无形中就扩大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市场，生态移民也因此将矛盾地——草原转换成了一个土地资源稀缺但劳动力丰富的区域，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村没有什么区别。其结果是传统畜牧业被排挤，而畜牧业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随之逐渐消失。生态移民造成了传统蒙古族社区社会结构的改变。

① Dickson, Debbie & Webber, Michael, 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Steppes of Inner Mongolia, PRC.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3, No. 3, p555..

② Dickson, Debbie & Webber, Michael, 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Steppes of Inner Mongolia, PRC.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3, No. 3, p555

(4) 少数民族教育面临的新挑战。新华网关于“两转双赢”的报道中(2006年11月27日)有这样一段话:

……锡盟人的眼光没有停留在当前,而是看的更加长远。他们把抓教育作为从长远上减少牧区人口的重要措施,努力使牧民的下一代走出草原。从2004年开始,对牧区中小学布局进行调整,到2007年,全盟所有的牧区学校都将撤并到旗县所在地。同时,他们还对上高中的牧区贫困学生给予一定的补助,力争到2010年普及高中教育。当这些来自牧区的孩子坐在城里宽敞明亮的教室中、享受着良好教育资源、感受着现代文明气息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绝大多数会放下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套马杆、牧羊鞭,成为新的城市人和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①。

笔者在白音锡勒牧场调查时发现原有的从锡林浩特市前往牧场的公交车取消了,牧场原有的医院、银行、邮局、小学和中学也都取消了。学校是在“一乡一校、优化教育资源”的活动中被撤并的。而在《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一书中对于中小学撤并是这样描述的:“加速牧区人口向城市转移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推动。首先是非农就业……而非农就业对人口转移所发挥的作用有限,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的最有力的杠杆是学校的集中。近年来,草原牧区的中小学逐步向城镇集中,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牧民子女很少再回到草原牧区从事草原畜牧业,这是草原牧区人口减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由此也改变了草原牧区的劳动力结构。年轻的劳动力减少,草原牧区的人口在迅速老化”^②。

在采访著名生物学家刘书润时,他讲了这样一个小学撤并后到浩特(城市)里住校学习的孩子的故事:

住在学校的娜仁花想阿爸,想额吉,想念家里的小牛犊,想念家里的大黄狗,想着想着哭了。坐在教室里,那仁花望着教室外,想着阿爸和额吉会不会来接她,过一天,哭一天,一共上了七天学,哭了七天。

蒙古族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游牧时代,父亲承担放牧的责任,教育子女的责任通常由母亲承担。蒙古族传统游戏中至今仍然有插木头、玩扣绳等一百多种游戏开发孩子的智力。而从小与牛羊为伴,又能锻炼孩子的责任感,蒙古族孩子七八岁就能成为很好的骑手,十四五岁时已经是熟练掌握放牧技巧的牧人了。现代民族教育的一大困境则是到城市里接受现代教育的孩子,不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很少有人愿意回到草原区从事畜牧业生产。而事实上的确却有一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因为语言、文

① www.nmgzxbq.gov.cn/news/manage/news/news_show.asp?id

② 王晓义,《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化等原因,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学生就成了传统生计方式与现代教育中的边缘人。按照我采访的一位蒙古族老牧民的话说:“这孩子除了学会了洗脸,啥也不会。^①”现代教育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现代教育技术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本土化以便更好的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服务值得现代教育学者深思。

三、 结语与讨论

1. 讨论:人口与牧区的游牧文化。牧区是相对于农区而言的概念。牧区的主体人口应该就是牧民。1949年时,内蒙古牧区有24个旗,人口仅26.3万^②,占全区总人口4.3%。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牧区人口就不断增长。2006年内蒙古牧区人口已近500万,占总人口的25.2%。内蒙古2006年的总人口比1949年增长的是3.9倍,而牧区人口却比1949年增长了19.2倍。我们可从两方面理解这组数据:一是内蒙古牧区人口占自治区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不快;二是牧区人口纵向比较其增长速度却很惊人。这期间的人口增长由多种因素构成:自然增长主要受“人畜两旺”和控制人口计划的政策影响,机械增长主要受到1950年代牧区劳动力短缺和“牧民不吃亏心粮”的政策影响。牧区人口增长必然对游牧产生消极影响,因为游牧创造的价值不能满足人口发展的需求。

2. “生态”移民VS“经济”移民。各级政府的生态移民都强调生态和经济双赢,但少数民族移民则可能面临资源和文化双输的后果:这是因为政府更注重物质福利——增加家庭收入和提供现代化服务。但牧民的生活自主权和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传统则可能成为牺牲品。生态移民没有民族歧视。汉族和蒙古族都有被移民者。但不同民族移民中付出的文化代价并不相同。相较于主流社会,少数民族的移民要做出更多的文化牺牲。

事实上,甘肃宁夏的生态移民项目的设计目标本来是那些土地或水源稀缺、人口密度较高的贫困农村。内蒙古牧区选择生态移民作为发展路径,则是出于政府对于配置发展市场经济的各项条件(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而不是牧民本身的发展(如改善牧民福祉和增加牧民决策自主权)。这些计划的设计还表明,政府的发展往往把牧民的文化和资源权益当成经济增长“祭坛”上的牺牲品。因此单纯的经济增长远远不是科学发展观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发展的真理和方向。

笔者基于上述观察,认为内蒙古地区的部分生态移民是经济发展驱动型,未将牧民文化和自主决策权考虑在内。这样的经济发展在一些地区也许会带来进步,但它更可能催生诸多不平等现象,因而潜伏着影响社会和谐和消极因素。

① 蒙古族牧区因为缺水,在日常生活中当地蒙古人非常珍惜用水。

② 内蒙古大学经济学系白音锡勒项目组,《白音锡勒牧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第三章 草原与体制：反思草原围栏化

笔者从2009年5月到2010年2月，以白音锡勒牧场为田野点进行实地调查，之后陆续扩大到西乌旗巴拉格镇，最远到达东乌旗乌力亚斯台山下。其间经历了温带干旱半干旱草原短暂多风的春秋两季和同样短暂但极其美丽的夏季与漫长而饱受风雪困扰、因而严酷的冬季。冬天的严酷与夏天的美丽使笔者从心底感受到蒙古族牧民何以如此痴迷地敬畏“腾格里”，“顺应”大自然，而不肯义无反顾地加入现代科学三番五次发起的“征服改造”大自然的圣战。按照萨皮罗(Judith Shapiro)的说法是“War Against Nature”^①。它迄今为止的战绩就是使草原的自然景观千疮百孔，民族文化肢离破碎。其整体的生态后果则可能更为严重。

笔者2009年5月4日初作调查时，曾问到一位大巴司机家乡何处。他饶有兴味地说起了关于他家乡的顺口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我们保康（太仆寺旗政府所在地）”。他的原籍是内蒙古昭乌达盟（现更名为赤峰市）。1950年代，他父母被当地政府动员到锡盟太仆寺旗支边，在保康镇落户。尽管仍然种地，但那批移民都拥有城镇户口和工人身份。

移民的进入除了改变了当地民族成分，还变革了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他父母刚到太旗时时，人民公社还以畜牧业为主，其他产业都围着畜牧业转。他们家做木工，工分就没有牧工高。但1980年代实行“承包制”后，家家都分了草场。牲畜一多草场就越来越差。于是，他们又响应政府号召改种青贮，政府还购进了喷灌机，搞起了节水农业，种植土豆等作物。此外，草原上还树起了电线杆、出现了挖煤机和风力发电机，且处处可以看到规划整齐的农田。在他看来：“（闲）荒的草原“在我们这儿是没了，再往里（到草原深处）走，才能看到。”

第一节 从开荒到围栏

一、话说“闲荒”

汉文献多有记载“塞外”处，含意总是塞外人烟稀少，有很多欠开的闲荒地。中国的中原地带多为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水源丰足、自古适合农耕开发。在这种生态类

^①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2001,1

型中生活的人们，视荒地为浪费，也视草原为待开垦的闲荒地。从农区移民到草原的人，仍然习惯种地。^①农耕王朝稳定边疆的主导策略就是移民实边拓展垦殖。中原统治者只有看到边疆“遍地是庄稼”时，才会确信统治根基扎稳。汉语文献中的“荒”字，可追溯到商代。中原王朝前往边疆开荒拓荒思想和政策绵延至今不下两千余年。“‘荒’是在农耕文明的文化下产生出来，被用来贬义地描述人力不及或未经人力加工和培育的自然环境和动物的状态。”此外，“荒”还意味着没有价值。“蛮荒之地”意味着人类难以生存之处。“荒凉”则指疏于人工养育或养育中断的境况。总之，“荒”就是有待于先进文明和技术的改变和改造，才会变成有价值的地方。^②

但是，在草原生态类型中生活的人们通常使用的“荒”字，并非等同于汉语中“荒”字的含义。在蒙语中“荒”为 atar，或者 atar gajir，为多义词。atar 的原意为原始状态草原^③；另外，atar 还可以指地面裸露、没有草或其他植物覆盖而无法用于畜牧的土地；此外，atar 既可以指称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也可以指农耕后土地肥力不够、无法继续农业生产的土地^④。因此，在农耕地区以外被认为可以用于开垦的草原，在游牧地区的人们看来可能是最原始最适合游牧转场的草原。

传统农民没有“草场”的概念。他们认为草地就是荒地，越是水草丰美的草场，越值得垦殖、种植或采挖，否则就是闲置资源暴殄天物。蒙古人则认为对草原的敬畏与保护就是最好的开发和建设。因此，农耕民族统治内蒙古草原的时期，都是草原退化生态受损的时期。只是由于清末之前的中国草原大体是游牧与农耕民族在轮流统治，草原生态才在多个世纪中大体保持平衡，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和大面积的荒漠化。近代内蒙草原的大面积荒漠化始于清末“新政”至 20 世纪末。在此百余年间帝国、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体制不同，但它们接触的西方文明和时代精神是相同的，所以“重农轻牧”的产业选择相同，垦殖草原的文化价值导向也大同小异。

游牧民族能够维护草原自然生态，不仅在于畜牧，更在于游牧文化。那种认为游牧民族是靠减少人口维持草原丰美的看法，只是一种主观臆断。游牧民族更重视人一

①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乡土本色》中说，“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象是向十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

② 廖中白，《农耕文明中国之省思：从人工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谈起》，《学术月刊》，2007 年第 2 期。

③ 如腾格尔的《蒙古人》歌词中唱的 atar her（草原）是我的家，在这里 atar her 是指保持了原貌的草原。

④ atar 的这一含义近似于汉语中“荒”一词，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询问农耕蒙古人“你的地好不好？”时，如果不好，会回答说：“荒了”（直接使用汉语中“荒”这个词发音），而不会回答说“atar”。据此是否可以推断，atar 的第三种含义是在与农耕文化接触之后“引进”的含义，所以在不同的生态类型中人们形成的观念也存在各种差异，当以一种生态观推测另一种生态环境时，会得出与另一种生态观差异较大的看法，在农耕文明中认为是荒芜有待开垦的地方，在游牧文明中可能是保持原始状态很好的草原，而农耕人认为是荒芜不能耕种的地方，在游牧人看来是裸露地表、寸草不生的，且不适于游牧。

畜—草原的关系。蒙古族及其先民自古就生存在“人—畜—草原—神明”的互动循环体系中。草原丰美确是游牧生计健康与否的关键指标。牧民最看重草场资源并视其为生命之根，有神明的草原才是牧民的精神支柱。

蒙古族先民在驯化和培育适应内亚草原严酷自然条件的五畜的同时，更经营出一整套堪称精湛的生产工艺，还系统地掌握了草原动植物群落和地上地下资源的相关知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生态观和文化生态伦理。正是基于这一些知识、技能和传统，游牧民族才在几千年里保持了草原状态基本完好。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 L. N. 古米列夫所评价：“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①。

遗憾的是，现代农耕民族对此总是缺乏认识：“逐水草而居”是他们描述游牧文化标准词语。他们把不定居的北方牧民视为落后，更把林海中的猎民视为野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实施的“定居化”政策，虽在吸收定居文明长处方面不无可取之处，但把牧区的贫穷落后统统归于游牧生活造成，进而在解放初期做出在两个五年计划内使牧区完全定居化的决策却是沿袭“农耕先进，游牧落后”传统思想的体现。

二、主流社会自然观的丢失

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是人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基础。任何哲学都包含其本身的自然观。现代汉语中的自然在中国哲学中历史悠久。但历史上的自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与文化相对的客体“自然”，而是有其自主能动性的自然而然”，即事物在天地之间的有机运行。道家尤爱自然之理，它显示了遵循气之自然流转的妙处，而没有强加上与人类社会对立的印记，更不是人类剥夺的对象。

中国哲学的悠久历史更给自然提供了合理的能动地位：平和的自然与环境始终是社会政治和谐的重要象征。兼通和兼管农人与牧人的皇帝或天子承担着和谐“天人”关系的使命。儒学将人的使命定位于构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秩序。人类有为天地立心的责任和使命。正因为如此，人类才有了制定和解释历法的能力^②。

西方的现代化扩张不仅打破了中国本土的天人关系，而且把天人二分且相争的“自然科学”理念引入中国主流学界。从此，自然被客体化，成为人类为了发展进步而可以控制和征服的对象。^③1919年五四运动后“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

① 廖中白，《农耕文明中国之省思：从人工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谈起》，《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第22页。

② 参见本人发表在《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的文章《生态移民政策的文化根源分析》，第68页。

③ 根据罗维勒在《儒学与生态》一书中的论述（第266页）：像很多西方技术词汇一样，自然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最早出现于1926年一本关于西方哲学的中文词典中。

(science)被急于寻找强国之术的国人请来填补清帝国覆灭后的国人观念真空。从此,中国不假思索地加入了国际“发展”大军。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含义具有非常强烈的现代性内涵。这种“自然”是人类要与之对抗的客体。这种观点在文革十年与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截然不同时代里被一如既往地推崇和发挥。“人定胜天”,“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和使自然为人类服务的观点已经在现代人心中坚不可摧。^①

“自然”现代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线性或单线进化的思想,即所有事物都会遵循相同的路径进化到相同的终极目标,例如“落后”的采集渔猎社会终将被“先进的”工业社会所代替。它的早期典型论述可见于《筹蒙邹议》:“视观此方(蒙古地方),数万里之区,自汉以来,绝少进步,则游牧之不则视为生计...游牧生活断无持久幸存之理,恐不出五十年,游牧之风将断绝与地球上。”^②这在今日中国,仍然是国民教育的主导思想。根据美国人类学家麦克·威廉姆斯的解释,学术领域形容草原生态的“退化”也是一个“含有生物进化论及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名词...理论上讲,进化思想认为人类历史应该以不断进步为特点,所以‘退化’一词意味着一种中断,有悖于历史前进的潮流。”^③

三、游牧民族的生态伦理

蒙古高原上的人们并非天然游牧,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考古发掘证明,蒙古高原的居民也曾农耕。在生计方式转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蒙古高原从间冰期暖湿气候向干旱大陆气候的转变。^④勃尔只斤·吉尔格勒的《游牧文明史论》认为:北亚游牧人在气候和生态环境发生巨变时,分别东迁进入森林或经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陆。这一人群的后裔拥有相同的自然、生态价值观,并分别以北美印第安人、挪威驯鹿撒米人和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讲述的生态故事验证这一的观点:

例一 印第安人的回复

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皮尔斯给印第安酋长西雅图写信,要求替美国新移民购

① 这段有作者译自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The China Journal*, No. 50, 2003: 37-59.

② 姚锡光,《筹蒙邹议》,台北:台湾台海出版社,1965年,第1页。

③ 由笔者翻译,原文为:“...a term connoting evolutionary advancement in both a bi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In theory, the historical march toward communism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continuous ‘jin hua’, so the presence of ‘tui hua’ indicates an interruption that runs contrary to the flow of history.”英文内容引自 Williams, Dee Mack, *Beyond the Great Wall: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Chinese Grassland of Inner Mongolia*, California: 2002, 219.

④ 以下印地安人、萨米人和蒙古人对自然概念的陈述选自李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买印第安部落的土地。西雅图酋长回复总统：总统从华盛顿来信说想购买我们的土地，但是，土地、天空、河流……怎么能出卖呢？这个想法对我们来说太不可思议了。正如不能说新鲜的空气和闪光的水波仅仅属于我们而不属于别人一样，又怎么可以出卖呢？……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必须记住：土地是神圣的……河流是我们的兄弟……因此你们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给予河流以慈爱……人类属于大地，而大地不属于人类……生命之网并非人类所编织，人类不过是这个网络中的一根线、一个结。但人类所作的一切，最终会降临到大地的儿女们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土地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上帝所宝贵的。我们伤害了大地，就是对造物主的亵渎。你们的命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所有的野牛杀光，把所有的野马驯服，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这一切，只意味着真正生活的结束和苟延残喘的开始。当最后一个印第安人与荒野一同消失，他们的记忆就像草原云影一样在空中浮动的时候，这些湖岸和森林还会存在吗？我们的灵魂还会存在吗？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初生的婴儿热爱母亲心脏跳动的声音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就要像我们一样的热爱它、照管它。为了子孙后代，你们要始终不渝地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精神和感情来保护大地，就像上帝对我们大家所做的那样。正像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一样，你们也是大地的一部分。土地对我们是珍贵的，对你们也是珍贵的。我们懂得一点：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没有人能够分开，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白人，我们终究是兄弟。^①

例二 萨米人的表述

驯鹿萨米人这样表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命题：“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开发大自然。我们是大自然的子女，子女不会去开发母亲；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环境保护，因为我们是生态的一部分。”^②

例三 游牧蒙古人的故事

蒙古牧人也一个故事：“一个孩子问她母亲：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游牧迁徙，就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吗？母亲告诉他：如果在一个地方定居，草原母亲就会疼。只有游牧迁徙，才能让草原母亲血液上流淌，浑身舒畅。”^③

游牧让牲畜从青草、绿洲、大河中汲取营养和水分，通过牲畜身体的生物机体加工出猎牧人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皮肉乳毛，牧放畜群，随水草迁徙，形成了游牧

① 周鸿，《文明生态学透视——绿色文化》，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73-75页。

② Ahte, Swedish Mountain and Sami Museum. 1993. *The Sami: People of the Sun and Wind*, pp.4-5. Jokkmokk, Sweden.

③ 来源于与刘书润老师的访谈。

民族。因此畜牧业是一种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畜群资源的生活方式，牧草和水资源是游牧文明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牧草兴衰与游牧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①

作者强调了牧草和水源在“游牧民族的兴盛和衰亡”中的作用，但未提及游牧生计所特有的土地所有制，即牧畜私有和草地公有在维系游牧文明中的作用。很多哲学家总结中国文化哲学的核心特点是“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伦理观。但很少人承认，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是用人的主体能动性适应自然生态的产物，因而是最典型的天人合一。

第二节 生产方式变迁

蒙古族的生活方式经历了前现代的古列延、阿寅勒、苏鲁克到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人民公社、牧业大包干、草畜双承包到2002年以来的“双权一制”。这一过程中的最大变化是草场资源（水和草场）从群体公用到个体私用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直接影响了蒙古族的社会组织结构、改变了蒙古族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直接的互动和沟通方式。在此过程中，既有农耕对畜牧业的冲击，基于“农耕优于畜牧”思想导致的政策偏差，也有国家现代化的推动。对蒙古族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分析可以1949年前后为界，也可以循着牧场资源（水、草）从公用演变为私用的过程展开。现将这一变化过程按照历史衍替梳理如下。^②

一、 历史溯源

蒙古先民并非一开始就以畜牧业为主，而是兼营狩猎、农业、驯养牲畜的混合生计。直到十一世纪，畜牧业才成为蒙古族的主要谋生手段。当时管理牲畜的方式是“古列延”，意思是众多帐幕结成环形圈屯营过夜。当时的牲畜私有，草牧场公有，氏族成员屯营时，牲畜合群游牧集体经营。

十三世纪取代“古列延”的“阿寅勒”是一家一户或少数几户人挤在一起屯营，在某一公共牧地上放牧。与古列延相比，这是一种规模较小、牲畜头数不多的经营方式，是大公有到小公有的组织形式。

十九世纪时，大多数蒙古人的畜牧业已经没有先前那样的规模，牲畜数量的减少

① 学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129页。

② “蒙古族畜牧生产方式变迁”部分的内容改变自《锡林郭勒盟畜牧志》第406—421页。此处的群体公用与个体私有都有相对意义。前现代的公用或游牧也有群体所有权的范围，现代的使用权私有也存在所有权公有的因素。

使大规模、远距离的游牧成为极少见的现象。当时通常是以个别家族或二、三家组成的小团体—独立牧户（阿寅勒），在不大的地面上游牧。到了清代，除了朝廷专营牛、马、羊群之外，又出现了“苏鲁克”制度，即封建王公、贵族和大牧主将大批牲畜成群交给贫困牧民放牧。而放牧人只得乳、毛，牲畜归畜主人。

二、解放初期至“双承包前”

（一）解放初期的经营方式

1. 苏鲁克形式：

苏鲁克是牧区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种牲畜放牧形式。解放后的苏鲁克，称新苏鲁克，即根据牧主牧工两利政策和双方自愿原则进行的放牧方式。新苏鲁克制度是有放、养双方签订合同，合同由三联组成，政府统一印发，旗、放、养户各保存一份，每年更换一次。合同规定期限不少于三年且调高了放牧户的收入。但牧主仍有利可图，不仅可以得到畜产品，还可以分到仔畜，而且牧工还有一定劳保用品。新苏鲁克制度因为对牧主、牧工两利，牲畜发展很快。

2. 互助组形式：

由于生产的需要，牧民建在已有劳动互助习惯的基础上，本着自愿互利，国家辅助的原则，从1952年开始，锡林郭勒盟积极组织了各种常年性的劳动互助组，为牧业社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临时季节性互助组，是根据风雪灾害、接羔、剪羊毛、打马鬃、打狼、走敖特尔和搞副业等生产季节和生产需要以浩特和苏木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一种劳动互助形式。

常年互助组是较高级形式的互助组，是组员自愿一年或长期地一起劳动生产、合群放牧、统一管理牲畜的组织。在放牧管理上采取分工合作、专人放牧和下夜制度，减少了牲畜的损失，提高了繁殖率、保畜率及牲畜的肉膘和畜产品产量。在放牧方式上选择水草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建立固定的冬春营地，进行搭棚盖圈、打草、储草和打井等基本建设，实行定居游牧，改善饲养管理，防病除灾、减少死亡，发展生产。

3. 人民公社时期：

1958年12月28日，全盟牧区仅用一个月时间便全部实现人民公社化。牧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体制以大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和三级所有制，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公社和生产小队有部分所有权。结果是生产大队管不到牲畜。畜牧操作仍在生产小队。畜牧的特点是分散和游动性较大，一般要以牧群作业组（浩特）为生产单位。小队能直接抓牧群组，结果形成生产在小队，分配权在生产大队的相互制衡，大队搞平均主义的现象。

4. 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锡盟许多地方恢复和试行了“两定一奖”、“三定一奖”、“新苏鲁克”、“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对畜牧业生产的创新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新“苏鲁克”制即牧业大包干，有两种形式：一是成畜保本经营，按承包头数提交5%-10%的仔畜（牧民叫提交纯增）；二是成畜保本经营，定比例分成仔畜。新“苏鲁克”制不改变生产资料（草场、承包牲畜、机具、主要设施）集体所有的性质、仍由集体统筹安排，在集体的制约和支配下进行分散独立的经营管理，方法简便，结算简单，干部、民众易懂易行；直接分配、不拐弯，能按劳动效果和质量兑现劳动报酬，劳动都能够各得其所，高度适应当时当地的现实需求。

(二) 草畜双承包及“双权一制”的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锡盟草牧场使用权承包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3年推行“牲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责任制，畜牧以四种形式分给牧民：一是“畜牧作价归户，分期偿还”；二是“畜牧作价归户，保体经营”；三是“无偿归户”；四是“统一经营，提取现金”。草场承包使用责任制1984年推行，明确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归牧户，草场使用权逐步划分到浩特或牧业组。

第二阶段：从1989年起，全盟深化草畜双承包责任制，推行有偿使用草牧场的制度，确定牧户或浩特的草场面积、收费标准，明确牧户和浩特在草牧场使用管理方面责、权、利。但由于种种主观原因，大部分牧区草场未能够划分到牧户，畜牧吃草场的“大锅饭”、“大户吃小户”等现象很普遍。随着牲畜头数的增加，草场超载过牧、退化、沙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第三阶段：1995年，盟委和行署开始采取《进一步完善草场牧场承包责任制》和《关于推行草畜平衡责任制的暂行管理办法》等措施，加大草牧场划分承包到户的力度，确定牧户草场的界限和亩数。到1997年，草牧场全部划分到户有偿使用。各牧户根据自治区《畜牧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履行承包合同手续，发放了“二证一书”。即草场所有证、使用证和合同书。

第四阶段：“双权一制”的落实——草场承包虽然到户，但牲畜头数仍逐年增加。大户的畜群迅速扩大，草畜矛盾突出。随着牧区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比如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部分牧民从事其他产业，承包草场不能充分开发利用。草牧场租赁、转让的现象越来越多，因而给畜牧业承包合同管理带来新需求。在此背景下出台的草场流转措施是深化牧区改革，加强草原保护建设合理利用，确保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1996年，牧区在草牧场公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长期不变的前提下，实施草场有偿转让制度。使用权流转的形式有：一、牧户间自发转包；二、集体收回牧户自愿放弃的承包草场，组织规模经营；三、畜牧多的牧业大户，租赁牲畜头数少的牧户草场有偿放牧。由于实行草场流转而草场得到了合理利用。草地生产率大大提高，也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

第三节 分析和反思

一、分析

（一）蒙古族的畜牧业解放前经历了多次部落及政权更迭，但牧区产权制度始终没有重大改变，即草场归部落领主或牧主，一般百姓有使用权。这些牧民尽管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但是他们通常拥有牲畜。牧场的使用权没有现在这样边界清楚，权限明晰，也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入草场，随意放牧。《游牧文化的终结》一书中记载：各旗王爷及其下属能灵活决定草场使用权，因为他们既管百姓又管地块。各旗领地通常包括供春、夏、秋、冬四季草场。这些季节草场又分给不同的苏木和嘎查。因此，每个在地牧户都有使用权。这意味着各牧户虽然没有草场，但只要有人力就可使用草场。所有草场的使用权中，冬季牧场最有排他性。^①

当时的畜牧业不像现在的独户经营，也没有家庭牧场，而是以自发的牧组为单位。明朝期间，蒙古牧民一些家庭之间通常组织起来成为小组，组内不同家庭之间共享劳动力，这样有助于减少干旱、洪水或者暴风雪等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这些小组是构成经济、宗教社区最基本的居民点。在此基础上，毗邻的小组能通过非正式的协商机构共同使用它们共享的一些资源，并以共享资源的名称来命名他们自己，如“某某河流域之民”。^②

总之，牧地归领主所有，但属地牧民有草场使用权。这种体制对外来人口仍有排他性。他们不能随意使用本地草场。这种草场“公地”的边界清晰，因而与哈丁“公地悲剧”中假设的牧场向所有人开放和无偿使用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1949年之前，由于连年战事，草原上的牲畜数目下滑严重。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但草场私用直到1956年才落实。此前全国其他地方都经过土地改革后，土地归公，使用权分户。内蒙古自治区在这一点上体现了自治权利。在渐进的土地所有制变革中，乌兰夫和当时的自治区政府制定了“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政策。政府鼓励牧民自发成立互助组。组内成员分工合作，安排放牧。

① Sneath, David. *Changing Inner Mongolia: 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9.

② Williams, Dee Mack, *Beyond the Great Walls: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Chinese Grassland of Inner Mongolia*,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01.

1956年以后大规模建成的人民公社、高级社只是表面形式，如白音锡勒牧场以及锡林郭勒盟的其他地区曾经发生过每个公社里的所有牧民可以到公社食堂免费吃饭等现象。实际上，这一阶段的畜牧业生产活动还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开展的。那时有些国营牧场的放牧仍由蒙古族牧工用走场等方式进行小规模游牧。但多数牧民和职工定居下来并有了畜牧之外的其他产业活动。但其他产业支持畜牧业的大格局未变。此时的牧业“大锅饭”就有了两层含义：一种是有形的，如上文中提到的“社员到社里免费吃饭”；还有一种隐性的大锅饭，就是当时牧区比农区富裕且人口少，人均占地多，还有“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使周边一些汉族和蒙古族为躲避批斗进入草原。这些不熟悉草原生态环境和放牧技术的新人占用当地牧民的草场放牧，造成了部分草场生态退化。这在大包干和文革时期，还有在国营农牧场上常见。麻国庆在以白音锡勒牧场为调查点写成的《公有的水与私有的水》一文中曾写道：

蒙古族对于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有着一套合理的方式。他们会从水和草两方面来考虑放牧。从“水”的方面来讲，牧场一般限于沿河流湖泊一带的地方，从“草”的方面来讲，每一块牧场承载的牲畜种类和数量是有限定的。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有效选择，否则他们不会去冒着冬天的严寒和冰雪，早春的凛冽的寒风、夏日的酷暑和虫害，逐水草而牧。真所谓“水草随时选牧场，去留曾不隔星霜，全家迁徙无力别，白首何人认故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转场……但（外来牧工的）放牧点基本上集中狭隘的锡林河两岸，且相距甚近。以笔者调查的10分场为例，牧业点都集中在河流两岸。蒙古包有20多个、平房有40多、将近70个左右的放牧点。这些放牧点离河流近者几十米上百米，远者5公里，一般在2公里左右。而牧业点之间的距离一般仅仅相距为1—2里，有的甚至仅相距200—300米。这些牧业点周围、草场退化虽没有居民点明显，但草的高度已有1米左右降为不到1尺。在这些放牧点，每户至少都放着300只羊左右，多者700—800只。因此，放牧点都集中在锡林和两岸，无疑是对草场的毁灭性的破坏^①。

（三）草畜双承包制度的推出与改革开放后农区推广“包产到户”的时间段相吻合。下面摘录的三段领导讲话体现出畜草双承包责任制的政策目标除旨在纠正此前“大锅饭”的政策偏差、发展经济外，还要解决当时初露端倪的生态问题：

周惠（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1984年5月14日作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农村牧区商品生产搞活经济的七项规定》报告：

“要想把草原的有关事项办好，一是要维护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二是要建立起一个持续高产的畜牧业生产体系。归根到底，就是要按照草原的自然规律和畜牧业生

^① 麻国庆，《公有的水与私有的水——游牧和传统农耕蒙古族“水”利用与地域社会》，《开放时代》，2005年1月刊，第86页。

产的经济规律办事。”

布赫（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1984年7月4日在全区牧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把这种“双承包制”全面推行、坚持贯彻下去，就能引导牧民逐步摆脱小生产的封闭状态，突破自然经济的束缚，走出一条适合我区牧区实际的社会主义畜牧业发展道路。”

周惠 1984年7月8日在全区牧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我们现在搞“双承包”，就是最大限度地把劳动者与劳动成果联系起来。……但是水草丰美也有它的“坏处”，就是身背这个包袱，躺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吃“大锅饭”，结果把丰美的草场沙化了，这是人为造成的。……牧民要走建设养畜的路子。牧民的经济繁荣、畜牧业的现代化，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要靠自力更生精神。第二个问题是把人与畜、畜与草，人、畜、草的关系协调起来，这样把关系牧民切身利益的几个环节联系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牧民的生产积极性。”

布赫在全区牧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8月8日）：

“在旧的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中，人、草、畜这三大要素，一直处于彼此分离、彼此脱节的状态。过去在牧区工作中，我们虽然对草原畜牧业的经营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但多是对人畜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调整，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人与草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这是造成沙化、退化、碱化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畜与草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人与草在权、责、理上的分离。草畜双承包不仅解决了人、畜矛盾，也解决了人、草矛盾，这就为逐步解决畜、草矛盾提供了条件。…草畜双承包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把草原彻底承包熬下去，群众的干劲才能使在草业上，才能走出一条建设养畜的路子来。”^①

简单讲，“草畜双承包”就是要让牧民在争取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不得不关注生态效益。这种将蒙古传统公用草场即传统游牧经济的根本划分到个人的政策带来了牧民生产生活所有领域的变革，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的支持，包括：牧民定居、草原围栏、舍饲圈养、人工饲养草料、水利资源的利用等等。这一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就是美国经济学家1968年提出的“公地悲剧”论，即公有资源注定会因为过度使用而致枯竭。为避免草场承包后牧民过度增加牲畜数量，草畜平衡论和载畜量管理成为保护草场的主要手段。

“草畜双承包”实行至今已二十多年，国内外学者对其成效作了大量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草原“草畜双承包”制度打破了“草原无主、放牧无界、草原无价、使用

① 上述领导讲话均选自《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文献资料选编》（第二卷下），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委员会编印，第245，252，432页。

无偿”的旧观念，树立了“草原有价、使用有偿、建设有责”的新观念。^① 有学者认为以保护生态为目的的“草畜双承包”因为阻挡了动物的迁徙，使动物只能在围栏草原范围内啃食草场，造成草场沙化，草原物种单一（大牲畜，尤其是土种大牲畜因为食草量大，连续在围栏内啃食践踏造成围栏内草场退化），不利于天然草原的生物多样性演变，不利于天然草原稳定的演替状态。^② 也有些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认为围栏草原造成草场退化还造成牧民的支出增加和牧民贫困化。2001年起，政府进一步推行禁牧休牧政策以恢复退化草场，并配套出台了生态移民和舍饲圈养等配套政策，这其中政府投入的资金巨大。^③

二、围栏化的文化反思

草畜双承包制度实施中，草原被围栏分割成多个小块，畜群再也不能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固然住进了定居房，不必再在严寒与酷暑中寻找水草丰美的地方躲避雨雪和（草原黑、白）灾难；牧民生产的单位也限定为各自的家庭，互助与合作——这种蒙古民族的人际交往模式——也不再必要；围栏的草原使畜群中牲畜的数目变少，但是劳动强度却大大增强了。他们对自然的依赖、顺应少了，因为种植青贮、打井饮畜等改造草原景观的活动也使他们加入了对自然宣战、改造自然的行列。蒙古人常说的“对草原的保护就是对草原最好的建设”也变成了谚语而不再是实践的准则，因为没有人再按照传统规则行事。围栏围封起来的不只是草场，还有草场上的牲畜和由此衍生的游牧科技、草原知识和蒙古族文化。围栏缩小的不仅仅是牲畜的运动空间，还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和蒙古人的思想空间。传统的“农耕文明优越论”固然会导致草原的开垦并像垒院墙一样将草原围封起来表明使用权，但当“农耕文明优越论”遭遇（误读的或者未经验证的）西方理论，并联手制定关系民生的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地方知识和传统文化而制定出简单化政策时，后果不堪设想。

① 徐志信，陈玉琦，《草原管理与畜牧业持续发展》，《内蒙古草业》，1997年，第4页。

② 敖仁其，《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③ 敖仁其，《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第四章 科学与权力：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畜种改良及其他

第一节 畜种改良的现代性隐喻

白音锡勒牧场成立的初衷是要建立现代化的国营农牧场。几年后改成锡林郭勒国营种畜场也是为了发展现代化的草原畜牧业。自牧场成立以来，“现代化”和“科技”两个词就是它不变的纲领。六十年后的今天，“现代化”和“科技”更是草原管理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那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科技？它包含哪些特征？目标又是什么？现代化和科技会给草原文化和民族社区带来什么影响？本章从分析这两词的含义说起。

一、何为“现代化”？

学界政界对“现代化”的解释很多。有的偏重经济理性，有的偏重科学技术，还有偏重社会文化变迁，不一而足。本文关注它与社会现代性的关系。

1960年代以来，“现代化”在世界许多国家大行其道。“现代化是指伴随着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社会与经济变迁”。^①它与工业化、城市化、高度社会分工、现代教育、发达的服务体系、发达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体系等密切相关。因此，人们一提到“现代化”，就会联想到经济的繁荣，摩天大楼，股票市场，工业制造，民主法制和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但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最主要的标志还是经济指标和GDP增长率，因为所有的“现代化”都要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西方工业化物质文明上。^②

“现代性”指欧美历史上因文艺复兴而开始的现代主义文化心态。它的显著特点是对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价值观念即科学理性对于技术发明、政治进步和社会文明所起的关键作用。^③

那什么是理性和科学呢？当今学界认为它是一套求知和检验事实的方法。但在政界和主流社会，它还是一种“正确”和“权威”的标示。由现代化和科学技术支撑的现代性观念在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内地一直流行，例如“科技兴场”是白银锡勒牧

①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9页。

②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40页。

③ 凯蒂·加德纳，《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场贯穿始终的发展方针，并努力通过种畜改良达到发展现代化畜牧业的目的，并给牧民起到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国外一些科学认为美国的畜牧业之所以走上现代化道路是因为引进美利奴羊等优良品种、进行品种改良，由于品质的改变获得了市场竞争力的看法。因此相信科学的发展必然能带来畜牧业现代化成了种畜改良多次在草原上实践的动因。

二、畜种改良概况

“畜种改良”在不同语境下也有不同含义，本文中所指的“畜种改良”主要是指引进外来品种与本地品种杂交的改良方式。白音锡勒牧场在1950年10月1日成立之初名为“白音锡勒国营牧场”。它作为全国第一个国营牧场而开了国营畜牧经济的先河。1957年，它又改称“地方国营锡林郭勒种畜场”。几年后，它成为全国农业十大样板之一。文革时期被兵团接管改称“31团”。1976年兵团撤离后划归地方，改称“白音锡勒牧场”，恢复了地方国营农牧场体制。

《白音锡勒牧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一书记载：该场1950年代就形成了以八大畜牧兽医和五大机械技术员为代表的第一代科技队伍。这为白音锡勒牧场1957年改名后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先进行畜种改良的牧场提供了技术基础。^①齐博益编著的《锡林郭勒畜牧志》用25页（370—395页）讲述畜种改良的内容，其中有羊改良、马改良、牛改良及军马、军骡之改良四类。

畜牧场的畜种改良始于1952年的绵羊改良^②。其序幕是用考利代半细毛羊做人工授精的种羊来改良传统蒙古羊。同年，内蒙古察盟国营牧场也采用茨盖半细毛羊人工授精改良蒙古羊^③。本文根据《畜牧志》和《白音锡勒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把包括白音锡勒在内的内蒙古60年畜种改良分为分试点时期、大集体推广时期、分户经营推广时期和新时代的生态保护时期。因为畜种改良涉及范围广、跨越时间长，本文仅叙述绵羊改良过程。它同样历经试点、推广、整顿提高、培育本土细毛羊、建设基地旗等多个步骤，时间跨度将近六十年。

（1）试点阶段：

1950年代的内蒙古畜种改良集中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进行，且主要集中在锡林郭勒种畜厂、太仆寺旗和黄旗这几处。当时当地引进了高加索美利奴和苏联美利奴公羊作种，目标是改良传统的蒙古羊。从1952年到1954年共建成配种站6个。《畜牧志》记录了一个典型案例：

① 内蒙古大学经济学系白音锡勒课题组编，《白音锡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页。

② 关于锡林郭勒盟改良羊的介绍改编整理自《锡林郭勒盟畜牧志》第337—370页。

③ 齐伯益，《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8页。

1954 年秋，锡盟西联旗特莫勒互助组从锡盟种畜场买了两只考历代种羊，盟政府派去 3 名畜牧兽医技术干部给旗蒙古羊试点人工授精 70 支，除 2 只母羊流产外，60 只母羊次春天产羔 102 只，受胎率达 88%，繁殖率达 170%，保育率 100%。秋 8 月下旬，杂种羔活重最高达 37.5 公斤，剪毛 0.75 公斤，同旗蒙古羔 36 公斤，剪毛仅 0.35 公斤。牧民高兴地说：“这是人畜两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象征。”^①

(2) 推广阶段：

绵羊改良经过互助合作由点到面逐步推广。1958 年，国家农业部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面动手大搞绵羊改良工作”的号召。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锡林浩特召开了第七次牧区工作会议，下达锡察两盟绵羊改良任务 74 万只。10 月，锡察两盟合并，盟委发出“加强畜牧业生产领导的决定”，把绵羊改良列为政治任务。1958 年一年内，自治区在原有种羊 363 只的基础上新拨种羊 1325 只，分配人工授精器 596 套，显微镜 50 套，辅助器材费 13120 元。1960 年，绵羊改良大跃进。全盟调查数字显示：改良羊达到 70.32 万只，占小畜总数的 15.75%。

(3) 整顿提高阶段：

1963 年，内蒙古召开家畜改良辅导站站长会议，锡盟确定了“以养好畜种为纲，继续巩固与提高家畜改良效果，集中改、重点改的工作办法”。

1965 年春，锡盟召开家畜改良座谈会，盟长总结四条经验：领导重视、群众运动、技术保证培养重点和以点带面。同时，改良几年后，出现发展数量和提高质量与饲料生产棚圈建设不足的矛盾。同时提出了合理利用草原水利建设以保证畜种改良工作顺利进行的要求。

(4) 培养细毛羊，建立基地旗阶段：

尽管培养细毛羊新品种在 1960 年就已在畜场开始，但其大规模推广和基地旗的建设却是在“分产到户”之后才形成势头。1986 年，正蓝旗被列为国家细毛羊商品生产基地县。1987 年多伦县、太仆寺旗被列入基地县。基地建设资金由国家出大头、地方出小头、牧民自筹资金构成。锡盟还在同时实行了澳美种羊杂交技术推广、绵羊改良集团承包等创新活动。

《畜牧志》成书于 2001 年，生态保护阶段的情况将在下文中介绍。

三、分析和讨论

本节要讨论的前提是：边疆少数民族并不是主流社会——特别是主流社会的国民教育中——所刻画的那种原始、保守和落后的形象。海上交通昌明之前，西部特别是

^① 齐伯益，《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70 页。

西北少数民族由于地处古代丝绸之路和近代欧亚交流陆上主干道沿线，所以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接触外界信息和实现科技及文化创新的条件和动机，一直都比主流社会更多也更强。

蒙古族在千百年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民间选育技术。新中国成立前，蒙古族能很方便地通过远距离游牧来创造引种和选种的机会。当地牧民向来注重畜种群中的公畜管理和公母比例。当地牧民把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三和十一日定为“去势留种日”，在此期间，由老牧民把评定留种的牲畜烙印入群，不能留种的小公畜则做耳记准备去势淘汰。去势手术由伶俐手巧的牧人担当。一人一天可为牛马几十头，羊几百只实施去势。此外，串换畜种的工作还能在那达慕、修庙宇、祭祀放包等活动后进行。^①

解放后由国家倡导的畜种改良于内蒙古草原意义何在？从前文“推广阶段”提到1954年的事件来看，内蒙古1947年成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后，草原牧民对新生活充满憧憬，也充满了建设现代化国家和自治区的热情。在当地人眼中，国家和自治区现代与否的标志是畜牧经济能否大发展，而要实现发展就必须选择现代科学。由于科学技术出身于现代西方，而现代西方又代表强权国家，所以科学技术在内蒙古草原上既有着令人眩目的诱人光环也有令人想象的神秘面纱。既然草原人把光荣与梦想寄托于它，它也就能实实在在的主导人们的思想和活动。解放之初，在传统落后与现代先进、科学真理与封建迷信在大草原上共生时，得到国家、政府和主流社会知识界支持的科学从来到内蒙古草原与当地入见面之初，就开始扮演“熟悉的陌生人”的角色。

到了整顿提高阶段，畜种改良的可靠性问题已经出现，包括新畜种所要求的“生产棚圈的建设跟不上”。这是当地牧民难以想象的现象：改良畜不适应当地气候且需要更多专人看护。据当地牧民所说，改良羊属外地物种，不适应当地寒冷气候。羊下羔子时身边若无人看护，半小时内就会冻死。这种羊羔落地最初几天还要穿一种特制的坎肩保暖。相比之下，本地羊就省事多了：苏尼特羊羔出生2天就能跟着母羊下地。改良羊则要1个多月。费事就意味着生产成本增加（新羔更要牧民在夜里每2个小时起来照看一次）。此外，改良羊不仅不耐寒，而且食草量大，最终需要舍饲圈养，成本因而急剧增高，最终导致牧民不满。这一阶段的畜种改良在资金补助和思想动员的双重保障下进行。

但仅能满足单方需求的博弈结果毕竟不圆满。畜种改良的阶段性和成果，甚至所有阶段的胜利都不能扭转改变其失败的结局。笔者最近收集到的如下案例颇能说明这种情况：

牧民苏以拉巴特尔住在东乌珠穆沁旗最东端的乃林高勒，那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他开车接笔者去他家的路上，发现路边有一头种公牛。苏以拉巴特尔下车说：“哎

① 齐伯益，《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0页。

呀，这牛好！这是本地的土种公牛。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们下车靠近这头庞大如小山的牛。它的眼神并不友善，正把脸上一种特殊腺体在草上蹭，大概是为了在那里留下气味。苏以拉巴特尔说：“乌珠穆沁本地牛能吃苦耐劳也能忍耐严寒。它在本地经过上千年演化，适应气候和草情。这几年为了畜种改良，很多本地畜种都被强行去势。乃林高勒也许太远，所以少数本地畜种还能逃过此劫。”

据苏以拉巴特尔说：“我也引进过西门塔尔牛，前年冬天还引进了十头。但当年冬天就被本地牛顶死了一头。那牛肉多也算有优点。每头能多卖一千多块。但它不耐寒，要人伺候。冬天不能放出去，而要人喂。费的人工算起来也跟多卖的钱差不多。那牛肉也松。我们本地人还是喜欢吃土牛肉，土牛肉香啊。”^①

这跟《畜牧志》和各类畜牧生产报告讲的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现有资料对畜种改良都按牲畜种类划分。畜种改良的大集体时期（1956—1982）相当于上节的试点、推广和提高阶段。包产到户阶段（1984—2000）则相当于上节的建立基地旗和目前的生态保护阶段（2001—2008）。尽管畜种改良的内容始终如一，但动员的类型却不同，依次为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和生态保护驱动三种。

大集体时代的畜种改良有着强烈的行政色彩。正如上节“推广阶段”记录所述，政府帮助并鼓励建立专门的人工授精站。1959年政府要求“人民公社建立家畜改良委员会、指挥部等形式的机构，由各级党政领导挂帅，坚决贯彻、全民动员、畜牧兽医干部全体参加，分片包干，定期检查，大搞家畜改良。”随后，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下发了《关于1959年家畜改良辅导站设置办法方案》，要求在全区建立家畜改良辅导站50个，精液供应站8个，其性质为国家事业单位，由当地党政统一领导，经费由自治区划拨预算。这就为畜种改良能够推广下去提供了最后的保障——经济资助。此外，政府还在人、财、物等方面提供了种公羊、授精器材等方面的帮助，这些措施使改良畜比例逐年上升。最极端的时段是1960年：

“我区的绵羊改良工作经过连续两年大跃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去年全区适龄母绵羊约有70%进行了改良和杂交，头数达到326万只……根据内蒙古党委召开的农业书记会议确定牧区40%的母羊要在七月份全面开展夏季配种接羔（部分旱灾严重，母羊膘情不好的可以缓配），无论农区或者牧区配冬羔工作都必须用细毛羊种公羊配种改良。”^②

但这种做法的水土不服也逐渐显现。首先是畜牧业成本大幅上升。尽管改良羊的个体产值高（某些单项指标如产毛，奶或肉），但其需要配套的饲养条件，如水资源、草料等，这些都是内蒙古草原最珍贵稀缺的。舍饲圈养这些牲畜会导致定居并引发草

① 引自天下溪教育资料《草原故事》。

② 齐伯益，《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0页。

场退化等严重后果（后果在“生态驱动的畜种改良”部分分析）。内蒙古各地土产戈壁羊和乌珠穆沁羊则完全可以在自然条件下实现繁衍。

包产到户阶段的畜种改良更有了明显的市场导向性，这与1980年代草场承包到户后，牧民的放牧空间受到限制、且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有关。畜种改良从此开始走下坡路。白音锡勒牧场退休场长谈到滑坡原因说：

“我们当年多辛苦啊，从新疆、澳大利羊引进种羊，没日没夜地干，（引进）有利木赞（母牛），黑白花（奶牛），考历代（羊），美利奴（羊），（培养出本地）细毛羊。你看这一包产到户，没人管了，这些人（牧民、牧场职工）乱（配）养，看啥值钱养啥，一下子又都回去了。”^①

此时的畜种改良无法持续的原因有二：一是制度变化，即包产到户、发展市场经济等原因导致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大集体时代建成的配种网点也多呈瘫痪状态；二是此时在畜种改良博弈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市场而非行政命令。尽管这位前厂长没提到生态问题，但是养殖改良畜所要付出的资金和环境代价应是最直接的原因。

虽然大集体时代的畜种改良也受经济因素影响，但是比较间接。当时的牲畜由政府统一收购销往国内外。例如，政府倡导阿拉善牧民养殖卡拉库尔羊，称可出口中东赚取外汇。当地蒙古牧民最初也抵制把刚出生七天的卡拉库尔羊羔杀死剥皮的做法。但后来也把羔羊卖给宁夏或甘肃过来的汉人执行宰杀工序。基层政府也照顾养殖卡拉库尔羊的牧民，每天多给他们记一个工分。分产到户后，由于卡拉库尔羊体形大，吃得多，活动范围也大，加之政府不同意组织羊皮羊毛出口，当地人就重新养起了传统的戈壁羊。草畜承包到户后，市场的调节作用更为直接明显。1980年代，山羊绒价格暴涨，一些地方就引进辽宁盖县山羊与当地山羊（与鄂尔多斯山羊产绒量相同）杂交，结果险些使当地优质的阿尔巴斯山羊种系遭受灭绝之灾。但在所有制约因素中，生态环境是最大主因。白音锡勒牧场虽然被设计成细毛羊研发基地，但其自身条件并不适合养殖细毛羊。它是一块针茅草原，针茅很容易附着在细毛羊的长毛上并旋转扎入体内，结果不但影响羊皮质量，还会导致羊的死亡。草畜承包以后，牧场职工自主决策，不到三年就将细毛羊全部淘汰，改回土种羊，原因是“太难养了”。

白音锡勒牧场前厂长没提到草畜承包后制约畜种改良的经济成本。那是因为牧场始终有农业播种面积，因而不仅能满足职工吃饭，还能提供青贮饲草：

① 素材来自2009年8月与牧场老厂长的谈话。

牧场播种面积及亩产统计表

年份	总播种面积	亩产(公斤)	年份	总播种面积	亩产(公斤)
1953	85.5	46.8	1981	109321	43
1957	20970	69.4	1982	118255	88
1962	73867	35.2	1983	103900	53
1965	72666	44.2	1984	96357	63
1970	112272	70.7	1985	90619	54
1975	113852	54.3	1986	82100	37
1976	116127	42.3	1987	77500	46
1978	109330	51.6	1988	80300	29
1979	96357	73	1989	78800	53
1980	95354	32.9	1990	83700	66

内蒙古自治区 2000 年开始实施围封禁牧。牧民在此背景下为使生活不受影响，就开始对牲畜“压缩数量、提高质量”。这等于开始新一轮的畜种改良。地方政府这次提供了草场优惠、低息贷款和其他很多配套措施。政府推动这轮畜种改良的逻辑是：好的牲畜品种能提高生产率——即在不增加牲畜头数，不给草场增加压力的前提下，牧民的收入也能提高。

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例如在有些地区，养殖了改良畜的牧户可不受草场全年禁牧的限制，春季过后即可在草地上放牧羊群。养土种羊的牧户就不能享受这种优惠。改良畜盗牧的罚款也比土种羊低得多。一些地方政府还用各种项目为牧民改进基础设施如暖棚，沼气，厕所和牧草籽等。畜种改良技术由政府免费培训。政府还通过国家良种畜种补贴项目，但牧民对饲养改良羊仍无热情。

这一轮畜种改良有两点不同于前两次：第一，它在保护生态的口号下进行。在当今舆论大讲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保护生态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从而具有更大的公益正当性。正如当地官员所讲：“我们会一直扶持下去，因为保护生态是公益事业。”第二，它对草原生态的风险性其实更高，因为它导致了新一轮的草原开垦。内蒙古的生态系统无法为改良畜提供充足饲料，政府只能购买和种植饲草料来保障供给。由于内蒙古草“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丰富”，所以在当地种植饲料更为可行，因而也更通用。总之，此轮畜种改良试图将畜牧业嵌入市场经济体系，再用外部农业系

统解决干旱草原脆弱生态对改良畜的限制。但因外部系统也受市场驱动而无法为改良的新牧业提供长期保障，所以此轮改良弱不禁风。

生态学家刘书润研究过白音锡勒牧场的草原植物分类，因而对当地畜种有独到见解：“蒙古族牧民说，我家的羊有18个爸爸，本区家畜应以本区品种为主。蒙古牛、蒙古马、蒙古羊，还有本地骆驼经过千百年选育，最适合本地自然环境，也最适合游牧。它们是牧民生产、生活、战斗、交通的必需品，是移动的商品、行走的银行，还寄托着牧民的文化 and 情感。本地畜种是蒙古族牧民的朋友，也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成员。只有这种适合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的牧畜才能受到牧民的欢迎。家畜改良和引种，不能拉游牧的后腿，不能成为定居、舍饲的借口。只考虑眼前利益，抛弃和我们共同生活了几千年的当地优良牲畜品种，与丢弃传统文化同样可悲。”^①

第二节 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科技

一、“两转双赢”之优化产业结构：学者与地方政府的观点和实践

畜种改良之外，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也被认为是增加牧民收入、保护生态环境以达到生态良性循环的重要手段。学界关于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论著颇多，学者多半认为当今的草原畜牧业需要进行现代化变革。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植物学家对于这种变革提出的理由和计划不同，但都对现代畜牧业比较推崇。

经济学家认为，产品只有达到适度规模才会有预期效益，规模过小无利可图，规模过大报酬递减。外国农牧场主都按经济规模组织生产。中国草原牧民则只会按照收付实现制来算粗账，很少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做详细的成本核算。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建忠教授认为，畜牧业是弱势产业，国际通常做法是制定特殊政策以保护其稳定发展。畜牧业发达国家都以政策措施鼓励规模经营。他认为扩大畜牧业规模的要旨不是增加牲畜头数，而是国家用资金赎买一部分牧民退出牧区，把草场和牲畜向大牧场主手里集中。^②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所的额尔敦布和认为今天的草原畜牧业是环保型经济，是在传统游牧业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他认为草原畜牧业继承了游牧业的几乎全部优点。规范的草原畜牧业具有保护草原环境的特点和功能，具有与草原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特点，可使草原环境状况长期保持良性循环状态，因而是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型经济。

^① 素材来自与刘书润老师的谈话。

^② 恩和等，《中国北方环保型农牧业与循环经济》，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但草原地区人口剧增的压力以及不断膨胀的市场对畜产品需求的拉动使近年的草原畜牧业已经走上了突破草原资源和环境所能承受限度的发展之路。如今的草原已不像传统的游牧业那样自我约束，在市场对畜产品需求不断膨胀、实行定居、牧民不得不在范围不大的承包草牧场上反复放牧、为满足致富欲望牧民不断扩大养畜规模等等不利因素的作用下，草原地区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超载现象。他据此提出了“规范而正常运行的草原畜牧业”的概念，指养畜规模控制在草原资源和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内，通过轮牧达到均衡利用草原的放牧畜牧业。简言之，草原畜牧业的规范化依赖于科技进步。^①

锡林郭勒盟政府采取了以“改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为内容的“两转双赢”工程。该工程比畜种改革的涵盖范围更广、涉及人口更多、力度也更强。据新华网 2006 年 11 月 27 日报道，“两转双赢”实行数年，工程设计目标基本达成：

“为解决草原生态恶化和经济基础薄弱问题，锡盟借助国家和自治区的政策、项目支持，确定了以“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为核心，实现生态良好和牧民收入提高的“双赢”目标。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就是摒弃对草原的掠夺式经营，推动畜牧业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着力从畜牧业内部寻求实现“双赢”的途径。通过几年的努力，锡林郭勒盟的生态环境恢复了往日天堂草原的盛景，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收获。实践证明，“两转双赢”是解决生态和发展矛盾的有效途径，完全符合锡盟地区实际。对大自然和大市场的双重挑战，传承了几千年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昔日以天然放牧为主的草原人，在吃过了苦头之后，不断提高经营方式的集约化程度和产业化水平，推进畜种改良、饲养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经营等，努力实现传统饲养管理方式向现代畜牧业的根本转变。

近年的锡盟人本着“种植一小片，保护一大片”的原则，开始大力推广灌溉高产饲料地，种植青贮玉米，缓解生态压力。每种植 1 亩灌溉高产饲料地，就能保护 50—100 亩天然草场。锡盟还把改良畜种、接冬羔早春羔、短期育肥、提高产业化程度作为压减牲畜头数、减轻草场压力的基础来大力推广实施，目的都中在草原生态的前提下提高畜牧业效益和增加农牧民收入。

以下是锡盟两改又赢的成效：

2003 年以来，全盟牲畜改良比重由 74.8% 提高到 88.8%；冬羔早春羔由 330 万只增加到 529 万只，占当年接活羔羊 88.1%；牲畜出栏季节由原先的八月底提前到六月下旬，出栏率由 81.4% 提高到 93.8%；牲畜繁成率由 84.9% 提高到 91.9%；死亡率由 1% 下降 0.7%。粗略计算，通过以上几项措施，牧民人均增加纯收入 1400 元左右。同时，产业化程度明显提高，2005 年盟内加工活畜 780 万头只，占出栏牲畜的 95.7%，

^① 恩和等，《中国北方环保型农牧业与循环经济》，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63 页。

基本实现了不加工不出盟。

全盟畜牧业开始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不仅生态环境开始好转，牧民腰包也鼓起来了。在主动压缩牲畜头数 220 万头只的情况下，实现了牧民收入恢复性增长，建设养畜的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作个假设，如果锡林郭勒延续传统的产业模式，会是个什么结局？再作个假设，如果锡林郭勒大片草地全部被破坏成不毛之地，我国富饶的京津地区、中原大地将会面临怎样的境地？

外人今日驱车从草原上穿过，随处可见红砖修筑的牲畜棚圈、点式分布的灌溉高产饲料地和成群的西门塔尔牛、荷斯坦奶牛，还有作为“三牧”基础条件来保护和建设草原的重要设施：围栏。有些牲畜棚圈的建设水准已超过牧民住宅。^①

二、高科技喷灌技术

笔者初次走进牧场，就感到它与原先的想象差异很大。定居的生活、骑摩托放羊的牧人（其实是外地打工的羊倌），穿着坎肩的改良牛羊，为种植青贮饲料而引入的大型喷灌机。种青贮帮助牲畜过冬原是个别农牧户的做法，如今它已经成为“现代化畜牧”的经验。

白音锡勒牧场上报的“两转双赢”材料中就有如下典型案例：

牧场职工**为实现“两转双赢”，于 2004 年围封自家 1300 亩草场，处理掉全部小畜，购进荷斯坦高产奶牛 13 头，贷款 30 万元购进大型农机具 1 套，开发高产饲料草料基地 30 亩种植青贮玉米，坚持走以种促养的路子，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他为充分发挥水浇地的效益，规范和加强了种植和管理，林、网、水、电配套设施同步建设，不但提高了水浇地的产量，也有效保护了草原生态。

他精耕细作，注意种植、浇、灌各个环节，他去年种的青贮普遍单株高度 2 米左右，亩产 1.7 万斤左右，总产量近 50 多万斤，围封打草场产草 12 万斤，这样他不仅解决了自己养牛所需的饲草，而且剩余的青贮还以同样的价钱卖给邻近的牧户，减少了运输费用，使他们也受益。现在他的奶牛已经由原来的 13 头发展到 30 头，仅奶牛一项年收入就达 10 万元，青贮收入 2 万元，代耕收入 15 万元，年收入共计 27 万元左右，现在他不但还完了全部贷款，还准备扩大规模。事实证明，转变经营方式是大有可为的，“两转”完全可以“双赢”。^②

“两转双赢”实施后，白音锡勒牧场也购进大型喷灌机种植青贮，据称是为了发展干旱地区节水型农业。牧场青贮基地在扎格斯泰湖（蒙语“有鱼的地方”）附近，

① 原载《学习时报》2006 年 11 月 24 日消息，原题为：《关注锡林郭勒保卫战——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生态经济探索之路》。

② 素材来自牧场办公室提供的“两转双赢”汇报材料。

走入青贮地立刻能够感觉湿气扑面，这与草原上夏季的干旱、燥热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喷灌机巨大，旋转一圈需要很长的时间，水汽蒸发严重，远处仍有些玉米叶子微卷。场部领导说：“当地每度电要 0.78 元，维持这样一台机器的运转每天的电费花销很大”。

三、引进第六畜：多样的草原生态观与脱困法

传统农业文明喜欢“六畜兴旺”。蒙古高原牧民则讲“五畜平衡”。草原上的五畜是蒙古马、蒙古双峰驼、蒙古牛、蒙古绵羊和山羊。世界上四十多个有草原畜牧业的国家，多半只养 2-3 种牲畜，只有蒙古高原把五畜结合放养。这与蒙古族的传统生计、文化偏好和经济及军事制度有关。蒙古草原的“五畜”组合有其内在比例。几个畜种组合能更充分地利用草场。马喜欢吃草籽草尖，对牧场的要求较高。牛用舌头卷草吃，是牧场健康的标志。如果一个草场不能养牛，就说明它退化到了一定程度。山羊和绵羊对草场要求不高，但它们吃过的草场需要一段时间恢复才能再用。如果五畜不能平衡饲养并合理布局，草原就会退化，退化的草原又会影响畜种的结构布局。草原生态退化和畜种结构单一化，会导致畜种与草原生态失调和恶性循环。近年的内蒙古草原由于实行“草畜双承包”和草场围栏化，牧民在生计需求和利益驱动下向草场要效益，大牲畜就越来越少。例如白音锡勒牧场刚实行承包制时，还有 60 多头蒙古双峰驼和大批的蒙古马和卡巴金马。但由于大牲畜食草量和活动范围大，更由于围栏化后牧民其无法长距离放牧，而牲畜在围栏内反复行走会导致草场损毁，所以牧场就将卡巴金马当作马肉出口到日本（与牧场前会计访谈得知）。现在多数牧民只饲养牛羊。

“两改双赢”和草场承包后，各地牧民的草场数量差异很大，西乌珠穆沁旗每户牧民 1500 亩草场，东乌珠穆沁旗每户 2200 亩，二连浩特地区则更多。白音锡勒牧场属于职工较多的国营单位，每个职工只能承包到 550 亩草场，家属 225 亩。很多家庭无法靠畜牧业维生。场部领导讲，从 2000 年至今已有将近 1/3 职工离开了牧场，或进城打工或另谋生路。他们有的把草场退还给牧场（可用每平方米 800 元优惠价换购锡林浩特市内住房一套），也有人把草场出租给本地牧业大户或者外来经营者（如前述阿拉伯纯血马场经营者来自河北唐山），也有人让草场闲置。由于很多闲置草场没有围封或围封后巡查次数少，又引发了盗牧、非法开矿、挖采药材的事件。专家们对如何解决闲置草原、保护生态、增加牧民收入 又有多种建议：

中科院某研究员提出了的新思路是将牧区牲畜转移到秸秆过剩的山东等农区，又将农区集中饲养的家禽转移到草原牧区散养。他认为：“草原最大的优势是生态环境很好，但生产力很低，延续了几千年的畜牧业没有科技投入，在农区，每平方米养鸡七八只；在草原，几百平方米养一只的空间都够...‘畜南下禽北上’可轻松解决草原沙尘暴、生态退化的问题；农区解决了烧秸秆、农田污染、农业生态不可持续的问题。最吸引人的是，这一思路能让农民牧民共同致富...全国养鸡约 47 亿只，糟糕的是，

农民们将鸡的生存空间缩小到几层铁丝笼子里，...而禽类需要的大量自由生存空间，不在内地的农家院，更不在铁丝笼里，而在广阔的草原。与牛羊相比，鸡对草原根本不形成危害，反而会有效控制草原虫害。所以，禽类要‘北上’。”

在谈到该方案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时他说：“在草原上，相对恶劣的环境对像‘禽’这种个体小的物种更实用，鸡本身就是草原的物种，现在草原上还有沙鸡。牛是农区以前的畜力，吃的就是秸秆。‘畜南下’实际上是恢复昔日的养殖传统...只要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突出，这个适应过程是很快的...中国是人口大国，我们的国情不允许农业走美国的道路，畜牧业走澳大利亚的道路行不通。中国的科学家有实力解决自己的生态问题！”^①

无独有偶，笔者在白音锡勒牧场也在 303 国道边的浑善达克沙漠边缘遇到一对祖籍山东的回族老夫妻。他们在草原上生活了 40 多年。他家用篱笆围成的院墙里没有牛羊，却有 3 只鸡。老人用牧草和树根做成勒勒车模型，还花两个月在屋后垒起了一个敖包，旁边立了两个梅花鹿模型。老人讲自己曾试图在草原上饲养过 15 头梅花鹿，结果不到两年都死光了。老人心里难受，就这样留个纪念。但引起笔者兴趣的还是草原上不常见的鸡。

Q: 您就两头牛啊？是不是今年干旱把牛处理了？

A: 牛在草场上呢。草原十年九旱，今年还算不错。我们家养了 12 头牛。你们看着旱，其实这草原的草壮，牛够吃。

Q: 您家院子里养了鸡。草原上养鸡还是养羊更合适？

A: (笑) 这个地方不养鸡，都养牛羊；你要是养 100-200 鸡，冬天的饲料就没法解决，你还得花钱买饲料，还得专门有人喂它。我养这些鸡是自家吃的，为了吃个鸡蛋；农村人自产饲料，我们这儿没有。

Q: 广告里说鸡“饿了吃青草，馋了吃蚂蚱”吗？咱们这里不是有草吗？

A: 你看这草能打下来吗？这蒿子籽什么的鸡不肯吃，还得靠喂粮食。这地方冬天长，冷的时候起码半年多。内地几个月就过去了。养鸡你不喂精饲料行吗？

Q: 精饲料贵吧？

A: 哎呀，我们现在买那个玉米面 100 斤就得 95 块钱，你能喂几天了？

这对老夫妻还说起白音锡勒牧场不远处，有一个叫伊和乌拉的地方，他们 1960 年代刚来时，见过那里的厂子里有人养了 200 只鸡。

① 部分内容改编自《中国经济时报》2006 年 7 月 19 日题为《畜南下，禽北上——一招资源与生态的妙棋》的报道。

“可热闹了，那玩意白天得有人跟着，晚上还得一个一个地捡回来，你见它的时候它要是正下蛋呢你还不能吓着它，就得在那等着。一个人放两百个羊没问题，这养了鸡以后，家里人就被拴死了。最麻烦的是冬天，你还得喂它。后来他那些鸡丢的丢，送人的送人了。再说鸡多少钱一只，羊多少钱一只，没法比。”

四、讨论：科技知识与权力

白音锡勒牧场成立之初以建立现代化的国营牧场为目的。建场文件中写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坚持用科技武装农牧业生产，是白音锡勒牧场的一大优势。“科技兴厂”是种畜场的重要发展方针。”^① 本章的三个主题：畜种改良、经营模式的转变、以及（将牧民从草原上迁出之后的进行草原动物迁移的设想）“畜南下、禽北上”均基于两个命题展开，即科学与发展——其中科学是手段，发展是目的。发展的主体是牧民，目的是让牧民“腰包鼓起来”。实现这一目的的路径就是现代化——包括产业结构现代化和畜种现代化。通过改良畜种，即高产（奶、肉和毛）且适应市场的外来畜逐步淘汰本土牛羊。生物科技通过这种方式深入到每个牧民的生计。但良畜种无法适应寒冷干燥的气候，还有食草量大和抗病能力不强等缺点。科学又用建棚舍、用喷灌农业人工种草、推广兽医技术等手段来解决。牧民世代积累的走场、去势留种等传统畜牧知识就这样在自己家里被一步步地淘汰出局。

阿瓦雷斯（Claude Alvares）在《发展字典——“作为权利的知识”引论》提出：科学与发展有着与生俱来的权力关系^②；古斯塔夫·伊斯特瓦（Gustavo Esteva）更进一步解释说“发展意味着从当前这种卑微的欠发状态解脱中解脱出来”。^③现代科学承诺人们既能摆脱这种状态，又能保持传统地方知识，实则大谬不然。

后现代学者福柯认为：权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宏观统治工具不是一部分人或某个组织、集团影响控制支配其他人或组织、集团的能力和力量；也不是“由谁掌握统治权，如何运用统治权，如何保护、巩固统治权，对谁施行统治权”等，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东西。他认为权力与知识相生、相养并相互为用。两者相互蕴含；没有系统的知识领域，就没有权力的用武之地。同理，没有权力的支撑，知识即使产生也得不到传播和应用。^④

福柯认为知识和学科都是科学知识纪律化导致权力集中的产物。福柯在《词与物》

① 白音希勒牧场经济社会发展课题组编，《白音锡勒牧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② Wolfgang Sachs,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Zed Books, 1991:212

③ Wolfgang Sachs,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Zed Books, 1991:6

④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中研究了科学、发现、发明的规则类型，提出了特定时空中具有特定认识型(episteme)的概念。他论述知识生产是一种集体实践。个体及其知识在实践中得到重新定位。这种认识使他怀疑科学和知识都是循着某种进步路线，服从某种成长规则的习惯性认识。他据此得出科学知识乃“集权”手段的结论。他认为知识的纪律化受制于国民教育，因而主要在大学里完成。由于科学知识占据着大学文化的主导地位，又因为大学生是社会的后备军，所以现代科学与国家异曲同工。^①

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畜种总是改而不良。牧民一旦有了自主权就选择土种牛羊。但畜种改良还是总能得到政府的资金、政策相配套的扶持和倾斜。

草原生态具有整体性，是人一畜一草组成的三位一体。现代科学用理性切分三者并据此制定生态环境对策，因而政策也跟着科学而缺少全局观。因此，我们就看见了锡林郭勒，看到蒙古草原乃至整个中国牧区的畜种改良、围封草场、季节性休牧、划区轮牧、直至全年禁牧、草场围封、生态移民和改换草种、畜种以及虽然没改变人种，但要牧人放弃游牧畜牧而到城里定居的一系列政治操作。

知识既然等于权力，权力就能决定什么“是”与什么“不是”知识。现代科学的权威知识，它能压倒一切，包括人们的宇宙观和人与自然的互动方式。这些被压倒、替代和围剿的传统知识本来不是科学的对立面，它只是因为具有“整体性”而不同于科学知识。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在全球各地的权力支持下向全球各地的本土传统知识发起“圣战”，试图扫清所有“异端”和“他者”的认识论和行动方式。内蒙古草原的60年实践证明，号称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现代科学知识其实只是一种权力幻觉。它在横扫一切本土知识后，留给牧区的只是技术废墟和知识空白。

①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第五章 结论

人一草原一牲畜是健康的草原生态系统必须具备而且必须和谐共生的三个要素。其中的人是主语和主体，而不是可以由别人随意定义的客体“群众”。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使命、人格尊严和价值追求。其中的草原不是农民和科学家眼里的自然景观，而是牧人和牧畜繁衍生命的共同根基，是牧人的生计家园和畜牧文化的生态屏障，因而也是作为牧民的人类通过理解气候土性和调节牲畜而经营出来的人文景观。其中的畜种，特别是本土畜种，也不是自然野生的纯天然生物或天之骄子，而是牧民用千百年的知识和心血培育选择出来的科技结晶和文化价值载体，所以传统的蒙古牧民不愿为了毛皮而宰杀初生的羔羊。

经济或生态移民-草原改制-畜种改良是现代国家在操作草原、畜牧生计、游牧民族及其文化时配套使用的三大法宝。这里的移民也是主语和主体，而不是可以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穿衣吃饭和随遇而安的“人口”。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或现代文化价值，生活追求和成就导向。这里的草原管理体制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性制度，而是带有文化选择能量和取向的权势机制。这里用于畜种改良的现代科技也不是懵懂无知和天真无邪的中性工具，而是一种因为操之在人所以就 very 知道在权益和博弈中执着地选择权力和金钱的知识社会学产品。

本文的故事围绕着传统草原游牧生计的现代化而展开。这里的草原畜牧生计方式如同人类学家宝力格所言：“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在很长时间内（它一引者加）也是定义民族性的象征符号，起到塑造群体身份认同的作用”^①。牧民一旦离开草原，放弃自己熟知的传统知识和放牧技巧，像进城务工的农民一样从事起出卖劳动力的陌生职业，他们就从一个游刃有余的放牧专家变成一个现代社会中的新劳工，从而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困惑，直到自嘲“不是农民也不是牧民，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②这里的现代发展也不是肯让云云众生均沾雨露的普降甘霖或普照天下的日月之光，而是如同科学现代化早期的马克思和晚期的福柯所批判的那种很能让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权力机器。这种机器锻造和格式化过的人，即使不会完全地数典忘祖，也会与自身的传统家园生分或异化。如果地方没有主体意识，居民没有文化自觉，那么经过现代发展锻造和格式化的地方，即使不变成丧失生殖和传承能力的城镇，也会成为对现代工业产品吸毒成瘾的农场或寸草不生的公路、水坝和矿坑。现代发展

① U.E.Bulag, *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Rowman & Littlefield, Plymouth: 2002,66

② Debbie Dickenson & Michael Webber, *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Steppes of Inner Mongolia, PRC*.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3, No. 3, 560

还有两个人见人爱的孪生兄弟，那就是“建设项目”和“开发投资”。但人们仍要警惕：这里的“建设项目”能把人们的生态家园变成经济战场，能把圣洁的传统文化变成庸俗的旅游消费品，因而未必是弱势群体的少数民族的福音。这里的“开发投资”必定不是能往穷人和少数民族口袋里钻的“裸钱”，而是紧紧地依附于权势结构为虎作伥，因而始于为现有的不合理权势结构鸣锣开道，终于使这种不合理权势结构得到强化的帮手。由于金钱和知识是现代人自信心最强的支柱，所以一不差新资本二不缺旧知识的中国主流社会仍处在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既“改造”跃跃欲试大有为的前夜。

正是有见于传统的“现代发展”有着如此恶劣的后果，正是因为传统的农牧业生态和生计是如此地难能可贵和难得易失，所以现代化初期的马克思要写《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期的列宁要诅咒“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晚期的西方发达国家更要发生后现代思想革命和人权环保运动。正因为这种老字号的发展观和发展方式已经直接威胁到作为中国立国之本的生态和民族文化多样性、所以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确定构建社会和谐的目标。温家宝更要把“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作为“建议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执政纲领。

本文叙事和论述的主旨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笔者努力站在草原畜牧人的主位角度，反复陈述草原生态三位一体中任何一“位”的变化或消失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紊乱或崩溃的道理。人是草原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和维护者。适当的人类活动和人口流动对草原生态系统循环不仅有益无害而且必不可少。草原人口压力过大时，采取一些化解措施也是理所当然。但如果这些措施不是恢复和维护草原三要素的平衡而是断章取义，如果被移出草原的“民”是最懂和最疼惜草原的少数民族牧民，那无论这种移民的理由是经济发展还是生态保护，其过程都是削足适履，其结果都会两败俱伤。从这种动机出发的所有保护少数民族民族文化遗产的办法也都会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事实上，我们看到本文综述的一些关于生态移民效果的调查就表明移民后生态没有明显好转，被移出的部分牧民也陷入了贫困加剧的处境。

主流学界始终足够现代化的学界认为传统畜牧业对“环境的过度依赖”是一种对自然生态“大肆掠夺的开发利用方式，而最终会造成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贫困—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王培先，2000）；还有学者更能直指环境恶化起因于“传统的逐草而牧、逐水而居的游牧生产、生活习惯”^①；更有“责备受害者”的学者做出如下结论：“传统农牧业实际上是一种外延粗放式的生产模式，越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就越严重”。笔者不敢妄言这些学者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传统畜牧业到底是怀有偏见，但国家按他们开出的药方操作生态移民的结果却已经造成了

① 刘学敏，《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效果与问题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4期。

草原“生态”与牧区“移民”的双重困境：生态陷入了“有人开发无人维护”的困境，移民陷入了“贫困加剧文化丧失”的困境。

平心而论，内蒙古草原实行大规模的移出牧民和开发之后，生态呈现的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虽然主流学界仍在不断推出为移民工程“正名”的研究新成果，认为只要国家有财力来支付移民的成本，只要迁入地的水源和经济环境配套就能继续移民，但也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生态移民在移入地造成环境新退化的问题。移民开发的现代家畜育肥和乳牛舍饲圈养业，确实能满足当代中国市场需求，于是“加强市场经济意识”就是对新移民不绝于耳的教诲。他们于是不得不为了发展短期育肥的牛羊和加速出栏率而在安置点周边的草原上种植能够青贮的秸秆作物，从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草原开垦。离开传统生态家园的新牧民观念确实更新了。他们在短短几年里就学会了大量引进和使用现代科学制造出来的化肥农药，因而污染了新家园的地下水。他们使用的大型喷灌机也能使干旱草原的地下水加速枯竭。这种开垦种饲料的畜牧方式能比牧民从前的天然草地放牧方式增加很多消费支出，因而很能调整或“打乱”牧民固有的生计结构。生态移民一旦被卷入市场经济，就果然如同《摩登时代》里欲罢不能的工人和穿上玻璃舞鞋的灰姑娘，只能不断地开垦新土地，不断加大新投资以维系这种在提高经济收益和毁灭生态环境方面同样有效的“现代化”畜牧业。

中国主流社会的人都知道农耕民族故土难离和背井离乡的苦痛和无奈。他们甚至也爱听腾格尔唱草原歌和席慕容的诗，但很少人能理解“游牧”的蒙古人也把草原当成家甚至当天堂。因此，离开草原乡土对于蒙古人的苦痛同样巨大和难以接受。现在很多被生态移民的牧人仍对五年后回到“围封放牧”的草场充满憧憬。2009年是吊庄生态移民的第九年，当年当地政府曾经向所有移民户承诺十年后回迁。最近一位学者曾在一个生态移民会上向当地一位领导问起“什么时候可以回迁？都能回迁吗？”领导说“这要看情况，优先回迁那些经济条件好的，能够规模经营的牧户”。^①

本文第三章探讨了“闲荒”一词在蒙汉语境下的不同含义。那结论也适用于“退化”。^②蒙语中没有“退化”的草场，只有“受蹂躏”的草场。科学家与老百姓各有治理退化草场的主张。游牧条件下，牧民会把好在好草场上吃饱的牛羊赶到差草场上，让牛羊蹄子把草籽踩进差草场的土里。牲畜的粪便和唾液都能给草场施肥。^③科学家们也能通过测量围封草场牧草的高度来证明草场恢复的程度^④。更懂草原生态的刘书润先生则指出：“草的高度不是评价草场好坏的唯一标准，草场内的植物多样性才是。

① 会议题为“三江源生态移民研讨会”，素材取自福特基金会的白爱莲女士的会上发言。

② 关于蒙古语中“退化草场”一词的含义得到了刘书润老师的指导。

③ 蒙大拿州立大学土地资源与环境科学系的 Clifford Montagne 向笔者提供了该校在蒙古国从事场植被恢复的研究手册 *Grazing Manual 2009*。

④ 阎玉春，唐海萍，《围栏禁牧对内蒙古典型草原群落特征的影响》，《西北植物学报》，2007年第6期，第1225—1232页。

草场内退化草场的比例不超过 30%就是好草场，就像从来不得病的人也不好是一个道理。^①”

尽管牧民与科学家的观点不一，但由于牧民的背后只有历久记忆而科学家的背后则有地方政府的意志和投资，所以围封禁牧还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得到了大规模的实施。同时出台的还有春季禁牧、季节性休牧、全年禁牧的措施。笔者无意贬低科学知识和现代技术在内蒙古草原发展中所起和能起的作用，但希望科学家和国民教育家也有当年蒙古族学者和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曾经要求的一点儿“雅量”，即承认现代科学并不是人类史上发明和发现的唯一知识。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也不应只宣扬西方的现代科学、现代化理论。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世代相传且由历史事实证明对解决本地问题行之有效的本土科技知识、生态伦理和人伦道德也应该在本国的国民教育体系，特别是在号称一流因而对少数民族知识更加封闭也更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名牌大学占有能够与他们的国民身份相称的一席之地。

笔者做这种基于学术但也有越界之嫌的呼吁，实在是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无可争议地压倒了包括畜牧知识在内的所有民族民间的传统知识。内蒙古草原上外来畜牲的生物“良种”也以很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优势战胜了本地牛羊的“土种”。尽管“改良羊腿越短，跑不了长道了”，^②但它恰恰满足了现代畜牧要求的集约化、规模化和定居化饲养条件，因而能跟科学和政治一起向城镇化进军。尽管改良畜种腿脚娇气，不如土种们好养，但科学会设计出专人照顾等程序进行弥补。尽管改良畜种口齿刁钻，吃不下本地草原长出来的饲草料，但政府能出补贴购买或通过开垦本地草原种植出来的精草料。尽管城镇化跟游牧方式格格不入，但现代技术和政府资金能帮它抽取地下水来做大规模的灌溉和供水，从而能使城镇的用水问题暂时地迎刃而解。至于草原最怕人类定居，因为只要有定居就会有退化和荒漠化带来的难题，也自有权力加科技来营造局部的园林景观来掩饰。至于远处城市要清洁空气和近处生态要可持续动态平衡，那也能通过另外一组科学家另外立一些项目申请到另外的资金来解决或掩饰。反正人生苦短，资深科学家在岗和官员在职的时间又比人生更短，因此有权和有钱的人总是不害怕生态后果，而害怕生态后果的少数民族和传统牧人则往往是既没有投资的金钱也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沙皮罗（Judith Shapiro）说 1950 年代以来，中国人对自然界的宣战从未停止且愈演愈烈。^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多数国人都通过原先免费现在也开始收费的国民教育，特别是通过其中的高等教育而获得了一种神奇而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必能适应制度，那里的现实也必能服从理论。剩下的例外则由科学再想科研项目、官员再制订新政策来剪裁。至于支撑这些信念和政策的资源，那就是更为深不可测的制度问题了。本文只能统计目前这种不

① 素材取自与刘书润老师的访谈。

② 摘自与刘书润老师的谈话。

③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2001, 35.

光彩博弈的阶段分数：中国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牧民，目前多半已经被逼上一条有去无回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即是一条能让市场资本、科学技术和官员权势联手高歌猛进的垄断之路，也是一条能让牧人、草原和本土畜种既蒙受生态、生命、尊严和资源权益损失，又能让它们承担文化原始落后顽固，生态严酷荒芜不毛和牲畜劣种无能低产之名的双重牺牲之路。这条路的名字叫旧发展观。

在旧发展观看来：少数民族牧民协作放牧的传统方式是吃“大锅饭”。游牧生计下牧民共用草场是“公地的悲剧”。他们深信“只能生态移民才能救牧人”、“只有私有化才能救草原”和“只有洋畜种才是良畜种”。当心疼牲畜也心疼草原的牧民因为习惯于集体共用草场而质疑私有牧场的边界时，草原上就长出了比没退化牧草还要丰茂的金属围栏。当围栏和外来人口使草场退化加剧时，又出台了生态移民政策，其中迁出的多是真正想保护草原的牧民。结果，经过科学改良的草原换了主人而草原生态更坏，经过科学改良的牛羊换了父系而品种更残废。围封的草场不知何年恢复。恢复后的草场使用权又不知花落谁家！整个草原真的很像“公地的悲剧”甚至像“囚徒的困境”了。敢问少数民族牧民和他们的传统文化路在何方？

这就是本文要找的结论。但老大难问题必有其复杂根源。复杂难题注定没有简单答案。但答案的“不简单”不能成为我们“不想辙”的借口。笔者认为草原生态和畜牧生计难题跟今日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一样，难处不在于其复杂的程度，而在于学者和肉食者视野拓展和胸襟开放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界打通经济学与政治学界界限的“新制度主义”、包括基于人性假设的“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基于环境条件假设的“历史博弈制度主义”正能提供一条可行思路，因而也正能为中国学界、政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各个民族社区所用。

顾昕先生在2010年《读书》第一期发表的介绍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玲通过研究公地博弈管理而为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提供支撑案例和行动导则的文章：“诺贝尔经济学奖缘何颁给政治学家？”笔者经过对比研究而确认，那就是中国求解草原生态和畜牧生计及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难题的必由之路。

顾昕先生首先介绍欧玲教授在其代表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为解决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难题而开列的前提观念条件：我们“应该接受而不是拒绝复杂性……科学进步包括要理解多层次可分解的复杂系统……要承认制度多样性的价值”。她接着提出管理公共事务或资源的如下八大要件：^①

1. 公共资源使用权必须有清晰边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2. 使用权规则应符合当地的条件(入乡随俗因地制宜);
3. 规则制度应该集体参与集体决策(公平正义互信互惠);

① 顾昕，《诺贝尔经济学奖缘何颁给政治学家》，《读书》，2010年第1期。

4. 监督规则应该明确而且公开透明 (裁判规则游戏之本);
5. 监督体系中要有分级制裁的原则 (裁判者亦有人裁判);
6. 要有发生争端时的冲突解决机制 (各方服从仲裁权威);
7. 自主管理权由政府认可法律保障 (自治单位有其权威);
8. 用明确章程确定分层管理的原则 (制度保证公平博弈)。

欧玲还在《公共事务治理之道》里通过对美国一些社区组织管理公共资源失败案例的深描而解说了前述八大要件的相互作用, 其中的关系与本文所讲草原生态所要求的“人、草、畜平衡极为相似。事实表明, 这是所有组织管理公共资源的不二法门。笔者在此能加上的唯一条件就是: 科学家、政府与牧民之间首先要有互信才能达成互利互惠和共赢的目标。

内蒙古草原确实出了问题。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内蒙古牧民的生计方式和传统文化, 而在于现代科学和现行政策忽视了蒙古族牧民的主体性和传统畜牧生计和科技知识的权威性。这种主体性和权威性首先在于: 不能用现代科学擅长的方法画地为牢, 用科学家孤陋寡闻的“想当然耳”来人为割裂草原上固有的人—草—畜三位一体, 而应该要对此做出通盘考虑和统筹安排。

笔者受时间和知识限制, 未能把蒙古牧民管理草原的传统规则与欧玲开列的“公共资源管理八大要件”做出对比分析。但基于蒙古族学者在这一领域里的前期研究, 笔者确信蒙古族管理草原的传统规则一定与此想去不远, 否则它就不可能运行长久。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那就证明了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理念: 阳光底下没有新事物, 少数民族都是按照互信互敬规则在传统“公地”上谋生和博弈的专家, 他们因而是在人性论博弈论基础上创新和实践新经济学的专家。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 [1] 阿拉腾. 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年
- [2] 李尔只斤·吉尔格勒. 游牧文明史论.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 [3] 白音希勒牧场经济社会发展课题组编. 白音锡勒牧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 [4] 恩和, 额尔敦布和, 双喜, 中川光弘. 中国北方环保型农牧业与循环经济.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5] 费孝通. 边区开发之赤峰篇.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 [7] 何怀宏.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8] 林韵然(译). 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 ——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 [9] 吕瑞兰, 李长生(译). 寂静的春天.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一版
- [10] 马戎.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 [11] 马汝珩, 马大正. 清代边疆开发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第一版
- [12] 内蒙古档案馆内部材料. 内蒙古民族团结革命史料选编. 1960 年
- [13] 彭国翔, 张荣南(译). 儒学与生态.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第一版
- [14] 杨淑娇(译). 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 [15] 色音. 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一版
- [16] 盛晓明(等译). 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7] 唐越, 苏力译. 法律的运作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 [18] 王建革. 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 [19] 王晓毅. 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 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 [20] 王晓毅(译).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 [21] 新吉乐图. 中国环境政策报告——生态移民.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9 月第一版

- [22] 闫天灵. 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
- [23] 杨礼银. 朱松峰 (译). 哈贝马斯——关键概念.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 [24] 周鸿. 文明生态学透视——绿色文化. 安徽: 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年

英文文献:

- Bulag, U.E., *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Rowman & Littlefield, Plymouth: 2002
- Humphrey, Caroline & Sneath, David., *The End of Nomadism-Society, 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1999
- Jonatha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1997
-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2001
- Ritzer, George,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its Classical Roots: The Basic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5
- Robert P. Weller. *Discovering Nature: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hapiro, Judith.,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2001
- Williams, Dee Mack., *Beyond Great Walls: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Chines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lfgang Sachs.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Ltd, 1992

期刊文献:

- [1] 敖仁其, 达林太. 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2 期
- [2] 包智明. 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及若干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1 期
- [3] 池永明. 生态移民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 《经济论坛》, 2002 年第 16 期
- [4] 达布等. 圈养是一场革命——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变革扫描. 《思想工作论坛》, 2004 年

- [5] 达林太. 内蒙古土地沙漠化成因研究. 《草原之友第二届会议论文集》, 2006年
- [6] 冬日布. 生态移民扶贫的实践与启示. 《中国贫困地区》, 2000年第10期
- [7] 盖志毅, 宋维明, 陈建成. 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及其对策.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 [8] 葛根高娃, 乌云巴图. 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的概念、问题与对策.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语版), 2003年第2期
- [9] 顾昕. 诺贝尔经济学奖缘何颁给政治学家. 《读书》, 2010年第一期
- [10] 胡自治. 草原的生态服务系统——降低服务功能的主要因素和关爱草原的意义. 《草原与草坪》, 2005年第1期
- [11] 侯东民. 草原人口生态压力持续增长态势与解决办法——经济诱导生态移民工程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 2002年第4期
- [12] 康爱民, 徐建中. 对牧区草原生态修复的认识与思考. 《水利发展研究》, 2004年第12期
- [13] 李皓. 论生态移民与民族地区现代化.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5年第1期
- [14] 李青丰, 胡春元, 王明玖. 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原因诊断及治理对策.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3年第2期
- [15] 李群. 我国近代畜牧科技的引进与畜种改良实践. 《中国农史》, 1996年第15卷第1期
- [16] 刘学敏. 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效果与问题探讨. 《中国农村经济》, 2002年第4期
- [17] 刘学敏, 陈静. 生态移民、城镇化与产业发展——对西北地区城镇化的调查与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2年第2期
- [18] 刘艳, 齐升. 明晰草原产权关系、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经济》, 2005年第9期
- [19] 麻国庆. 公有的水与私有的水. 《开放时代》, 2005年第1期
- [20] 马戎. 《体制变革、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一个草原牧业社区的历史变迁》, 博士论文, 1996
- [21] 潘鸣啸. 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 《社会学研究》, 2005年第5期
- [22] 皮海峰. 小康社会与生态移民. 《农村经济》, 2004年第6期
- [23] 任国英. 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移民的人类学思考. 《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 2005年第5期
- [24] 《人与生物圈》2007年2月刊“蒙古马”专辑
- [25] 史俊宏. 草原牧区生态移民问题研究: 以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06年
- [25] 宋波, 张力小. 应用牧草生长—消费模型分析牧民的放牧行为——作为对政府管

理行为的建议. 《草业学报》, 2005 年第 3 期

[26] 翁浩. 金莲花开了——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记行. 《环境经济杂志》, 2005 年第 9 期

[27] 杨明福, 白益民. 少数民族地区畜种改良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四川畜牧兽医》, 1998 年 8 月第 8 期

[28] 杨维军.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发展对策研究.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4 期

[29] 徐志信, 陈玉琦. 草原管理与畜牧业持续发展. 《内蒙古草业》, 1997 年第 1 期

英文期刊

Ahte, Swedish Mountain and Sami Museum. 1993. *The Sami: People of the Sun and Wind*, pp.4-5. Jokkmokk, Sweden.

Alfred Schutz, "The Stranger: 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9, No. 6 (May, 1944)

Dickson, Debbie & Webber, Michael., *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Steppes of Inner Mongolia, PRC*. *Journals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3, No. 3

D.N. Levine (1977), "Simmel at a Distance: On the History and Systematics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Stranger", *Sociological Focus*, Vol. 10 pp. 15 - 29

G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 1968

Schwartz, Henry. G., *Chinese Migration to North-West China and Inner Mongolia, 1949-1959*.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6, pp. 61-74. London.

网络资源

两转双赢和谐发展 锡林郭勒盟生态经济探索之路
http://chinaneast.xinhuanet.com/2006-11/27/content_8622393.htm

两转双赢. www.nmgzxbq.gov.cn/news/manage/news/news_show.asp?id

《中国经济时报》(网络版). 《畜南下, 禽北上——一招资源与生态的妙棋》.
<http://eco.ibcas.ac.cn/group>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生态移民政策的文化根源分析---基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W 村的调查 《贵州民族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68—71 页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中”的“文化”是什么? --挪威民族事务的法律与实践研讨会的启示

《凯里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第 28 卷 第 65—68 页

会议论文:

2008 年 3 月 22 日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 The Fifteenth Annual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CEAS),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宣读论文题目: Who Touch My Grassland?—Mongolian Environmental Culture, Ancient Mongolian Customary Law and the Dilemma of Modern Inner Mongolian Grassland Environment

2009 年 7 月 31 日 中国 云南 第十六届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

宣读论文题目: Culture Analysis of China's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Wustu in Horchin Left Wing Central Banner, IMAR

参加学术会议:

2010 年 1 月 15 日北京参加《三江源生态移民与游牧民定居交流会》

后记

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是我人生中收获最多的三年。能够完成论文写作并顺利通过校外专家匿名评审，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张海洋教授。张老师引导我走上民族学学术研究之路，并用自身严谨的治学态度时刻督促我学海无涯；当我为撰写毕业论文做田野调查之前，张老师亲笔为我撰写推荐信；论文开题之际，对我的开题报告认真审核，并不断鼓励我相信自己；对我论文的修改可谓字斟句酌，从大方向到文字细节，均一一提出宝贵的意见。张老师用自身的言行教会了我如何为人师，令我受用终身。

感谢民族学社会学学院的白振声老师、张曦老师和蟠蛟老师，他们的课程为我提供了论文的写作灵感、帮助我最终确定选题，并为论文的写作提供理论指导。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09 级的博士生王鹏为我作了全文的格式修订、规范行文，并在论文写作的最后阶段提供了宝贵意见；08 级硕士生王楠帮助我校对了论文的绪论和第一章，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要感谢我的先生、小女儿和哥哥姐姐，他们使我能够专心进行论文写作，使艰苦的写作过程不再孤独。

向百忙中对我的论文进行评审、参加我论文答辩的各位老师致谢！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本人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对前人及其他人员对本文的启发和贡献已在论文中做出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和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者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本人同意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将本人学位论文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资料库送交论文或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央民族大学可以将本人学位论文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复印手段和汇编学位论文（保密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字：

日期：2010年5月21日